

Spring 2011



# 亚洲研究动态

## Asia Research Network

March No.12

2011年3月 第十二期

北京外国语大学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主办

## 出版人

金在烈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 编委会顾问

周其凤 北京大学校长  
顾秉林 清华大学校长  
陈佳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饶子和 南开大学校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苏志武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程 伟 辽宁大学校长  
金柄珉 延边大学校长  
Mai Trong Nhuan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t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Tserensodnom Gantsog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Tin Tun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王孙禺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友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虎雄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ho Kau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ren Davaa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院长  
郭栖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主编 郭栖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谷晨曦 韩慧英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



## 特稿

- 04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召开2011年科研项目资助立项评审会议

## 学术活动

- 05 “美国中期选举与奥巴马执政前景暨美国的亚洲政策”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 06 “日本大地震的全球经济影响”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

## 研究进展

- 08 亚洲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
- 13 奥巴马政府新亚洲地缘战略评估
- 19 奥巴马政权下的日美关系  
——日本民众及舆论对奥巴马政权的评价
- 25 爱尔兰中国研究调查报告（1979—2009）
- 31 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对老子的认识

## 研究机构

- 38 亚洲研究协会

## 人物与著作

- 39 哈里·哈丁教授及其中国研究

##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召开2011年科研项目资助立项评审会议



2011年3月17日下午，“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2011年科研项目资助立项评审会议”在北京外国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张西平教授主持。

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有：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郭栖庆教授、科研处处长张朝意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教授、俄语学院院长史铁强教授、阿语系主任张宏教授、西葡语系主任刘健教授、德语系主任贾文键教授、中文学院院长魏崇新教授、哲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陶秀墩教授、亚非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淳教授、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雪涛教授、欧洲语言文化学院丁超教授、亚非学院韩语系苗春梅教授、国际商学院郭笑文教授。

此次会议的议程包括：1. 通报2008—2010年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项目资助立项与结项情况；2. 介绍

2011年科研项目资助申报情况、资助经费计划及评审程序；3.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出2011年科研资助立项项目。

与会委员认真审阅了2008—2010年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项目资助立项与结项汇总，听取了2011年科研项目资助申报情况、资助经费计划及评审程序介绍，对今年所申报的各类项目的具体情况交换了意见。之后，全体委员根据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2011年科研项目资助的要求和额度对今年申报的各类项目进行了认真、严肃、细致的评审，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确定了立项项目。

在此次评审会议上，共有18个项目成功通过评审，获得立项资格，其中课题研究项目12个，信息汇总项目2个，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3个，学术会议资助项目1个。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 “美国中期选举与奥巴马执政前景暨美国的亚洲政策”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2010年12月4日，“美国中期选举与奥巴马执政前景暨美国的亚洲政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和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美国研究、国际关系、政治学、外交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等领域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与在读研究生出席会议并参加了研讨。

研讨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孙有中教授与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美榕教授主持。在上午的全体会议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友法研究员、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周琪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梅仁毅教授等五位资深学者就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等方面做了精彩发言。

在下午进行的分组讨论中，学者们围绕“美国中期选举与奥巴马执政前景以及美国的亚洲政策”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交流，议题包括奥巴马执政前期功过评述、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解读、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趋势预测、美国

内外政策的国际舆论、奥巴马执政与中美关系等。

为了充分展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术资源优势与特色，增进相关院、系、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此次研讨会安排了关于“美国内外政策的国际舆论”的分组讨论，涉及世界各国对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的利弊得失与执政前景的反应与评价。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国研究中心、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国际商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俄语学院、亚非学院、欧洲语言文化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德语系、法语系、日语系、日本学研究中心、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等兄弟单位的教师与研究生提交了论文并进行了研讨。

在大会的闭幕式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谢韬副教授对研讨会进行了全面、生动、深刻的总结。此次会议对于认识美国国内变化与走向具有重大意义，也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谋求对美国外交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

# “日本大地震的全球经济影响” 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

2011年3月19日下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日本大地震的全球经济影响”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

出席研讨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专家学者有：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陈雨露，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永辉，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徐一平，亚非学院院长、海外汉学中心主任张西平，英语学院副教授谢韬。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嘉宾有：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副院长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朱青，《环球财经》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纪志宏，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原中国驻IMF执行董事张之骧，中信银行副行长曹彤，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贲圣林等业界专家学者也出席了研讨会。研讨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永辉主持。

会议首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资深日本问题专家徐一平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分别作主题发言。徐一平教授结合震后在日本交流访问的亲身经历，向与会嘉宾介绍了目前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徐一平教授表示，核泄漏是对日本的意外打击。东北六县整体生产水平占日本全国的6%至7%，如果全部毁掉其经济损失可能将占到日本GDP的5%，当地的汽车轮钻、在海上世界的三大渔业基地等产业将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也将影响世界核电发展走势。但另一个方面，重建过程也可能将成为拉动日本内需的一个要素，中日两国也可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郭庆旺教授从震后日本本国经济发展趋势、日本大地震对国际经济产业链的影响和日本的灾后重建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日本经济占世界经济GDP的6%，相当于全球经济的0.2%左右。如果核辐射不再发展下去，对全球经济的向好复苏将不会产生很大影响。此外，日本目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是否会造成巨大影响要取决于实体经济等影响。日本这六个县经济总量只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6.4%。是否会日本经济从去



年3.9%的增长率降到0.9%还值得商榷。但是在芯片制造业、旅游业方面，势必将给日本带来冲击。

随后，会议进入专家讨论阶段。与会专家和学者从日本经济未来走向、震后日本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震后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日关系、中美关系、能源安全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深刻阐述了此次日本大地震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最后，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陈雨露做总结发言。陈校长表示，北外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货币研究所对重大国际事件做出快速响应得到了外界的高度肯定和赞赏，今后要继续深化双方的合作，推动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对于日本大地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陈校长指出，日本大地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但是此次地震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走势可能不会带来重大负面影响；对于此次地震中出现的核泄漏事故，陈校长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自然的，我们必须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陈校长指出，此次我国对日本的危机救援体现出了公共外交对于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通过公共外交的运用来奠定未来中日政府外交和国家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契机。因此，如何正确有效地开展公共外交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和探索。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经济导报、香港文汇报、京华时报、经济观察报等多家媒体发文对研讨会进行了报道和高度评价。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 陈雨露：日本大地震难改全球经济复苏走势

“从世界的整体发展形势来看，日本大地震还无法改变全球经济复苏的基本走势。”3月1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陈雨露在“日本大地震的全球经济影响”学术研讨会上表示。

陈雨露认为，如果排除掉核泄露失控这一因素，根据灾害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日本大地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应当是可控的。也就是说，由于灾后重建新创造的经济增长通常与公共设施、居民住所、生产性资产重组成本和企业运营损失大体相当，同时考虑到日本东北部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世界的整体发展形势来看，日本大地震还无法改变全球经济复苏的基本走势。

但是，“日本大地震对于全球经济与金融的短期冲击不容忽视，我们需要加以应对和防范。”陈雨露说。他的逻辑是，一方面，在发达经济体正逐步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步入经济复苏的正常轨道，通货膨胀率普遍较低，而新兴市场国家业已进入经济高涨期，通胀压力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作为全球流动性的主要供给国和能源、粮食、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日本为实施危机救助而采取的强力度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会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更大的通胀压力；

另一方面，日本具有独特的经济增长模式，这表现为人口老龄化、投资消费需求不足、出口贡献度高、国内储蓄、外汇储备与公共债务长期维持高位等特点。2010年，日本失业率已连续两年超过5%，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降至59.6%的历史最低点，特别是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200%，如果再加上此次地震的冲击，日本的这一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能够持续？会不会身陷主权债务危机进而对全球资本市场、外汇市场以及货币市场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不言而喻，人类发展的历史当中，自然灾害的频发不仅严重破坏人类积累的财富存量，威胁着人类

生存的环境，也不断促使人们透过自然灾害的表面影响去深层次的反思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

从国家的层面来看，陈雨露认为，中国应该具备超前的战略思维与宽阔的人文视野，穿越危机，从东西文明交替以及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树立并引领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类观。30余年改革开放的探索，作为后崛起国家的中国已经成功的开创了“中国发展模式”，其核心的成就有三：其一，成功引入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西方市场经济的效率精神和创新思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其二，始终坚持渐进主义改革的模式；其三，充分发挥了三大比较优势，即劳动力资源、市场资源和举国体制，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汶川大地震的成功救援与该体制的优势密切相关。与此不同，日本是典型的“强市场、弱政府”而同时社会非常稳定的国家。两种模式均有可圈可点之处。

陈雨露表示，从本次地震后日本实施救援的实际效果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现代复杂社会管理之中，一个大国保持比较强的国家控制力将大有裨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摒弃西方市场经济的效率精神和创新思维。事实上，东西方文明各有长短、优势互补，我们只有将两者巧妙的融合，包容发展，才能推动或引领人类社会健康发展。

谈及中国参与危机救援应该采取的策略时，陈雨露认为，中国应当充分发挥公共外交的优势，用人道主义精神和互助共赢的思想积极参与危机救援。就像上一轮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中国主动援助受困国家，以及近期从北非撤离中国公民，其他国家同样全力为中国提供了支持一样，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与措施帮助日本抗灾，通过公共外交的运用来奠定未来中日政府外交和国家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契机。

(转载自经济观察网 2011年3月21日)

# 亚洲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sup>1</sup>

时家贤 辽宁大学

**【摘要】** 经济增长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于落后的亚洲国家来讲，制度因素，特别是制度创新至关重要。制度创新既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基础，又是亚洲经济增长的需要，制度创新是亚洲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动力和保障。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制度创新

二战后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让世界惊叹。对于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认为亚洲经济成功的秘密在于强势政府的干预，如青木昌彦。有的学者或组织认为，亚洲经济奇迹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如世界银行。有的学者则认为亚洲的经济奇迹是要素投入的快速累积所致，如克鲁格曼。也有学者把东亚奇迹归功于儒家文化。本文则从制度层面对亚洲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一国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技术、制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或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各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对于落后的亚洲国家来讲，制度是各种要素的基础的基础，制度是聚合个体的粘合剂，是各种要素实现有效结合的关键；亚洲国家制度创新的轮动效应既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基础，又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更是未来亚洲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动力和保障。

## 一、制度和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不断地扩大地供应它的人民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筑在先进技术基础之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sup>2</sup>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贯穿于经济增长的各个维度之中。制度制约着经济增长动力的整合、规模的大小、结构的

状况、速度的快慢、质量的高低。但制度本身并不等于经济增长，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是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实现的。这些传导机制包括：社会环境、激励机制、市场运行、经济需求、利益协调机制，等等。

1. 制度——社会环境——经济增长。制度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和框架，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制度的作用在于能够创造高层次的生产要素的环境，在于能够创造各种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从而影响社会经济增长。“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实际上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与劳务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sup>3</sup>也就是说，制度可以通过确定的制度安排，规范人们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提高交易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2. 制度——激励机制——经济增长。制度提供了激励机制，增加经济活动的动力，从而提高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制度可以通过对财产权利和知识产权提供保护，促进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的涌现，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制度可以通过明确界定的产权来明确权利与责任的划分，确保权利与义务配置得当，以充分调动每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经济增长。

1 本文为作者在2010东北亚论坛上的发言。

2 [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研究结果和意见》，《现代经济学文选》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4页。

3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5—226页。

3. 制度——市场运行——经济增长。制度可以通过正规的法令规章和正规的行为准则等来塑造微观主体的行为。制度也可以通过非正式制度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例如，惯例作为人们在市场活动中多共同遵从和认可的已接近正式约束的非正式约束，就自动调控和规制着人们的交易与交往活动。通过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约束，来影响市场经济的运作、促进了市场的成长、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

4. 制度——经济需求——经济增长。经济世界是由无数的个体构成的，开发每个人的需求欲望会推动经济增长。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制度能够刺激人们的需求。例如，非正式制度对需求水平和需求结构的影响。“哪怕仅仅是纯粹没有形成惯例的习俗的存在，在经济上也可能具有深远的意义。尤其是经济需求水平——一切经济的基础——最广泛由纯粹的习俗所决定”。<sup>4</sup>

5. 制度——利益协调机制——经济增长。制度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刺激结构，引导经济发展的方向。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通过利益的和谐，促进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减少外部经济效应，达到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和谐，人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和谐，确保社会的稳定，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反过来，经济增长动力的整合、规模的大小、结构的状况、速度的快慢、质量的高低又会促进制度的变迁。经济增长会引起社会环境、激励机制、市场运行、经济需求、利益和谐关系的变化，从而提出制度创新的要求，推动制度不断完善。

## 二、亚洲国家的制度创新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基础

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方面，它是现代经济增长非同期性的具体体现。现代经

济增长发端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19世纪中叶开始向欧美的其他国家扩散；在19世纪末登陆亚洲的日本，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才在非欧文化居主导地位的地区发生。另一方面，它又是现代经济增长绩效非均衡性的具体体现：有的国家增长很快、有的国家增长很慢，有的国家一直快速增长，有的国家只是快速增长了10年或者20年。例如，富裕国家的经济在1960—2000年间以2.7%的速度快速增长，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和80年代初都经历了快速增长，增长率分别为达到2.9%和2.3%，但随后却戏剧性地衰落了。拉丁美洲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里严重下滑，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定程度的回复，但一直处于“贫血”的状态。只有亚洲是唯一的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地区。<sup>5</sup>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世纪80、90年代，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生产力水平明显比亚洲其他国家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头10年末，中国又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谓的制度创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改造或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制度和规范体系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所谓的制度创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改造或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制度和规范体系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亚洲国家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亚洲国家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标准的行为准则（如华盛顿共识）的要求重塑自身的制度，也没有照搬英美国家的市场经济

4 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02页。

5 丹尼·罗德里克：《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模式，而是从各国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选择制度，逐渐形成适合本国特色的制度模式。亚洲经济增长，正是得益于亚洲国家的制度创新。具体表现在：

1. 亚洲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亚洲国家的制度重塑。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起飞，20

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还是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虎”的后来居上，无不是制度重塑的结果。

“为了越来越多地依靠个人的积极性和对外开放，经济快速增长的东亚国家都重塑了各项制度”。<sup>6</sup>如在贸易制度上，亚洲国家选择了出口导向，而不是进口替代；在经济制度上，亚洲国家选择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在社会制度上，部分亚洲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例如，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日本明治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体，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而且采取强制变迁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全力推进它的建设。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日本经济都得益于明治维新时期所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sup>7</sup>而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经济的腾飞则得益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2. 亚洲经济增长得益于亚洲国家制度创新的继起性或轮动性。亚洲国家制度创新的继起性或轮动性，维持了亚洲经济几十年的高速增长。20世纪50—60年代，战后日本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选择适宜的市场经济制度，很快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高速发展，从而掀起了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第一次高潮。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建立适宜、有效的制度体系，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掀起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第二次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国、东盟国家和地区为主体，通过制度创新，发展经济，掀起亚洲经济增长的第三次高潮。如今，中国和印度经济的腾飞，又成为亚洲经济

增长的新支撑点，靠的也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速度的快与慢、制度创新起步的早与晚、制度安排的好与坏，都影响着亚洲经济的增长。

3. 亚洲经济增长得益于亚洲国家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的多样性或差异性。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不存在唯一的形式。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与日本有很大不同，同欧洲的也存在很大差异。即便是在欧洲，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安排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如瑞典、法国和德国。在亚洲也是一样。亚洲国家在制度重塑的过程中，都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如日本的“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模式、韩国的“权威协调集体行为的市场经济”模式、新加坡的“法律规制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sup>8</sup>正是这些不同的模式，造就了各国不同的经济活动协调机制，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从而支持了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

4. 亚洲经济增长得益于亚洲国家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建设的并进性。正式的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如民主体制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非正式制度是人类在适应稀缺世界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试错过程与经验积累而成的，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内容。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基础和前提，非正式制度通过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说明和支持，成为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非正式制度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因而非正式制度的形成与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且社会变化的越快，这种滞后性越明显。所以，亚洲国家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结合。例如，日本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非常注重社会习惯的作用。日本人至今仍然很重视建立长期的比较固定的关系，日本企业与员工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也存在着长期固定的关系。日本企业的经理与普通员工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比较小，等等。韩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非常重视韩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作用，如1968年，韩国颁布的《国民教育宪章》规定，教育的目标应着眼于人的道德修养、理性的崇高、个性的丰满和精神的健康，注

6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58页。

7 金明善、车维汉：《赶超经济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6页。

8 左大培、裴小革：《世界市场经济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9—42页。

重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和精神，培养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而中国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则更注重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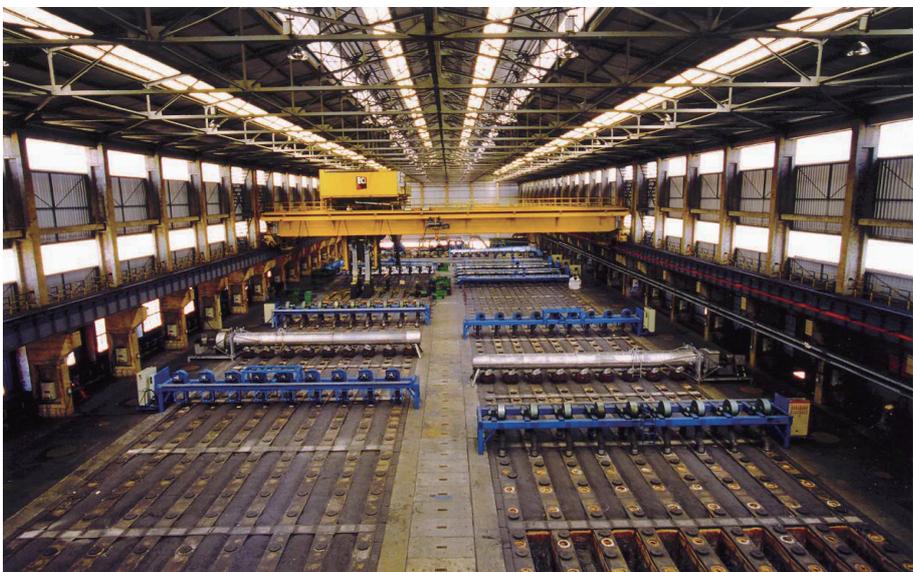
### 三、亚洲经济的未来与制度创新

无论是阐述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还是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践都表明，制度或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但制度的作用不是永恒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有一个生命周期的问题，永远适应经济增长的永恒的制度是不存在的。亚洲也不例外。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已经使得亚洲国家的社会环境、市场运行环境、经济需求状况发生了变化，使得激励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作用的条件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所有这一切要求亚洲国家未来的制度创新要更具深入性、广泛性和协调性。主要表现在：

1. 制度创新有利于适应环境的新变化。随着经济增长，制度诸要素或结构必然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发生改变。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全体国民的人均收入都有所提高。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生变化。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其他根本性变化也会随之发生：市场化程度、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制度的变化、家庭内部行为的变化等等，从而要求规范人的经济行为的制度、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制度、协调个人和企业之间关系的制度等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就是说，在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原有制度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制度的稳定就演化为制度的僵化，由此将阻碍经济增长，形成制度创新的压力。同时，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上会出现新的利益集团。这些新生利益集团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上保护自己既得的利益；必然要求对具有效率的权利进行界定；必然对社会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进行规定，进而改变制度结构，促进制度创新，出现新的制度安排。

2. 制度创新有利于防止“制度疲劳”。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经济环境会发生变化，原有的制度质量逐渐

恶化，制度的效率会递减，而国家或政府却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以精简它的制度而使其更具普适性和更少歧视性，因而出现“制度疲劳”。杉浦哲郎（2002）指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经济结构的“制度疲劳”。在他看来，由于经济全球化与技术革新的进展，从高速增长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支持日本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变得与时代的步调不适应了，从而引起日本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序”、“企业内工会制”等，这些制度在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威力，但是当它变成一种僵硬的模式后，则变为企业调整经营和降低人工成本的障碍，导致经济发展的滑坡。<sup>9</sup>



3. 制度创新有利于解决目前亚洲经济问题。亚洲经济增长虽然令人瞩目，但经济全球化问题、贫困化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世界市场的过度依赖问题、经济波动问题等不断释放变革制度的信号。如贫困化问题。亚太地区的快速经济增长减少了极度贫困收入家庭，但在解决婴儿死亡率和广泛存在的饥饿方面收效较小；经济增长与改善人们福利之间关系并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再比如老龄化问题。未来十几年里，亚洲国家将先后转入人口负担时代。而从世界范围内看，从老年化社会到老年社会，德、英、美、法分别经过了40年、47年、73年和115年；而日本只经过了25年；预计新加坡、韩国只需20年；越南仅要15年；且大

9 《如何看日本“病”与中国“强”》，载《环球时报》2002年10月10日第四版。

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进入人口负担时代时的人均GDP与欧美相比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在亚洲国家在不太富裕时就进入了这一时代。这不能不对现有的制度提出挑战。

4. 制度创新有利于维持未来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已经经历了几十年增长的亚洲经济，未来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问题。区域经济合作将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大势所趋。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创新将是未来亚洲经济的发展动力。因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机制，是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组成的三个“10+1”机制，还是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组成的“10+3”机制，或是“10+3”再加印度、澳大利

“一个国家制度创新的成功与否，与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在变革的速度上有快有慢，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度的改变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亚、新西兰三国的“10+6”机制，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合作的制度化的问题，以及制度的区域协调的问题。这都取决于各国在制度创新上所做的努力。

#### 四、几点启示

亚洲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亚洲国家的制度创新的继起性或轮动性。亚洲经济的未来仍然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努力。世界上没有一经制定永远适用的制度安排。对于处在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加快背景下的中国来讲，对于以实现民富推进国富为主要目标的中国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所以中国必须做到：

1. 中国应利用后发优势，吸取日本制度创新的经验与教训，加速推进中国各项制度的配套改革，避免出现“制度疲劳”。

2. 一个国家能否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关键在政府。绝大部分正式的制度安排，或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发挥，都取决于政府的理念、政府的行为、政府的能力以及政

府的稳定性。因此，政府本身的制度创新是重中之重。同时，要把政府力量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结合在一起，形成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合力”。

3. 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变革。一个国家制度创新的成功与否，与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在变革的速度上有快有慢，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度的改变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式制度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在制度的可移植性方面，一些正式制度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的正式制度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如市场规则、交易法则、贸易制度等，但价值观念、习惯、意识等这些非正式制度由于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制约，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即使能够移植，它也比正式制度要困难得多。因此，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习惯、意识等更多的需要国内建设。中国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4. 应对制度性挑战。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制度性挑战。中国经济增长的启动阶段基本完成，维持持续增长将成为中国今后的主要任务。而经济增长的维持要求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制度基础，以赋予经济抗御各种冲击的能力，并保持生产活力。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制度性挑战：一是与保持生产的活力有关的制度的转变；二是与加强冲突管理有关，更大的挑战是来自法律和政治领域的制度性转变；三是来自制度区域协调的挑战。所以，加快制度创新是中国实现国强民富的根本保证。



# 奥巴马政府新亚洲地缘战略评估<sup>1</sup>

沈强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研究部

**【摘要】** 为应对世界两极格局解体后地缘政治形势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更加重视亚洲，采取了新亚洲地缘战略。其主要战略意涵在于，将亚洲的地缘战略重心由中东和中亚向东亚倾斜，不断加大美对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的介入和投入，使之成为其新亚洲地缘战略中三个相互紧扣的重要环节，将冷战时期美在东北亚和东南亚构建的三条岛链延伸至南亚，从而强化和扩张美对亚洲的存在，使美在亚洲地缘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防范和遏制美这一有利地位遭到任何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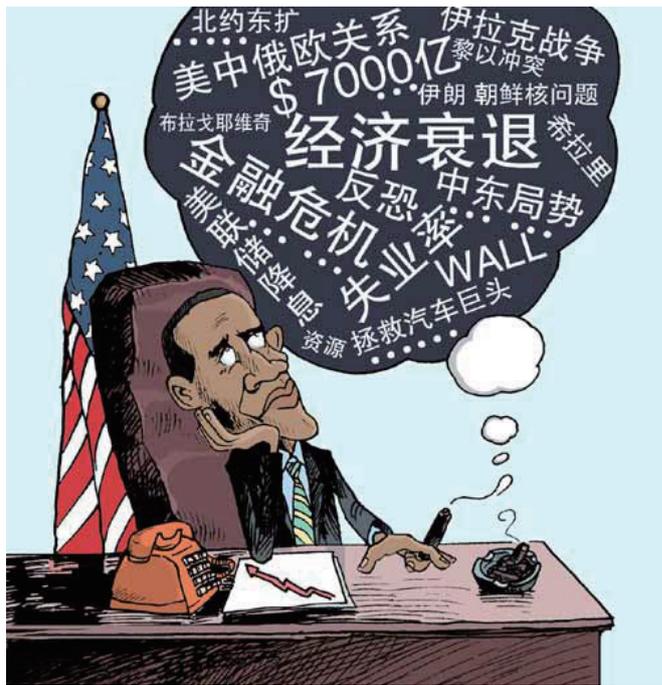
**【关键词】** 奥巴马政府 新亚洲地缘战略 战略意涵 战略背景 战略影响

近年来，亚洲对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显著上升，而欧洲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则呈相对下降态势。为应对这一重大变化，美国对其全球战略进行了相应调整，将其地缘战略重心逐步由欧洲向亚洲倾斜。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更加重视亚洲，采取了对亚洲加大介入和投入的新亚洲地缘战略。尤其引人关注的是美将原来的亚洲地缘战略重心由中东和中亚向东亚倾斜，在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加紧战略运筹和部署的新态势。实际上，这三个地区已成为其新亚洲地缘战略中三个相互紧扣、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已成为其强化和扩张美在亚洲军事存在，进而在亚洲地缘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所在。这一战略性举措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 其战略意涵

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初就以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自诩。当时，人们大多对此并不在意。其实，奥巴马之所以打出这一极不寻常的独特旗号是因为美的地缘战略具有深谋远虑的内涵和目标。现在，当人们回顾和审视奥巴马政府的新亚洲地缘战略时，不禁恍然大悟，原来这位美国总统是在暗示美与亚洲存在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因此，美不仅要保持对亚洲的永久性存在，更要统治亚洲，这就是“太平洋总统”的深刻意涵及其所要谋求的战略目标，也是世人很难理解和适应的美式逻辑和战略思维。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对亚

洲的重视确实令其前任望尘莫及。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其政要和军方高层对亚洲的访问接踵而至，多达30余次，这在美亚关系史上实属罕见。从奥巴马政府规划和安排的那些高规格和高密度的访问中可以看出，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是其访问的重点，因为这三个区域已成为奥巴马政府新亚洲地缘战略运筹和部署的关键所在。



1 本文转载自《外交季刊》2010年第98期，冬季刊。

## 一、东北亚是奥巴马政府新亚洲地缘战略中的首要环节

首先，从地缘战略角度看，东北亚战略地位独特，与美隔洋相望，是美登陆亚洲的最直接通道，因而对美而言，堪称亚洲大陆的门户。美若能在东北亚保持永久性存在，就意味着占据了亚洲的桥头堡。因此，美志在必得。

其次，从国际关系角度看，美与日韩自冷战以来就已结成联盟关系。冷战时期，美与日韩结盟的主要战略意图是与苏联对峙，但如今主要是防范和遏制中国挑战美的既得战略利益。当年，作为美盟国的日韩因国力和影响力有限，对美的战略价值也相对有限。但今非昔比，日韩不仅均已跻身世界经济十强，而且在军事上也



都已跨入世界强国之列。因此，日韩当今的战略价值在美亚洲地缘战略中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并已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更重要的是，美日韩在防范和遏制中国强大后挑战其既得战略利益中存在互有借重的战略需求。此外，三者防范和遏制俄罗斯崛起及迫使朝鲜就范等方面也存在形成合力的战略需求。这是当今东北亚地缘政治中冷战因素依然挥之不去的根源所在。

其三，从军事战略角度看，美对“三条岛链”加大投入和部署，强化对中国的战略性围堵，在这其中，日韩对美的战略价值已不可替代。甚至可以说，在东北亚地缘战略环节中，美若失去日韩作为军事联盟的配合与支持，就会陷入孤掌难鸣的战略困境，乃至最终失去在东北亚存在的立足点和根基。

其四，从六方会谈角度看，美对会谈乃至对朝鲜半岛的作用和影响力均呈下降态势，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力则呈相对上升态势。因此，借助日韩与美的联盟作用，不仅可使美与日韩联手对朝制

裁，以迫使其就范，更重要的是，还能对中国的上升态势产生制衡作用，从而抵消中国上升态势对美造成的战略压力。

## 二、东南亚是奥巴马政府新亚洲地缘战略中的必要环节

从地缘战略角度看，东南亚与东北亚同属东亚，在区域化合作趋势不断发展深化的背景下，两者在美的新亚洲地缘战略中已成为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的关键环节。而在冷战时期因美构建“三条岛链”又使两者具有历史渊源和根基。

而南海则位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腹地，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联系亚欧大陆的交通要冲，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非洲、欧洲、大洋洲的海上交通枢纽，是中国海上能源运输与贸易的主要通道。中国通往世界的40多条海上航线中有30多条都要经过此地，因此堪称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美对华关系中始终未能超越接触与遏制并举的惯性思维，因此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来到东南亚，加大战略投入和介入。美海军则从军事战略角度考量，将位于南沙海域的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列为战时的战略咽喉要道。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反复强调美要“重返”东南亚，且不断加大对该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投入，竭力拉拢这些国家，强化美与他们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其主要战略意图在于：

（一）通过拉拢东南亚国家，强化与其关系，对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快速发展势头形成制约，从而谋求美在中美东盟三边关系中的有利地位。

（二）利用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马、菲、文等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存在权益争端的国家，对美存在战略借重的需求和心理，趁机介入南海问题的处理，使之国际化，从而对中国形成多边制约，使中国陷于被动地位，而美则从中获得合法介入者和合法存在者的有利地位。

（三）从军事战略角度看，东南亚是美强化“三条岛链”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因此，美加大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投入和介入的战略目标是使之成为美的坚强盟友和可靠的战略力量，进而成为美新亚洲地缘战略中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 三、南亚是奥巴马政府新亚洲地缘战略中的重要环节

从地缘战略角度看，南亚北接中亚、西临中东、东连东南亚，是扼守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战略要地。南亚之所以成为奥巴马政府新亚洲地缘战略中的重要环节，



成为对东南亚战略环节的自然延伸和扩大，不仅是因为它与东南亚在地理上紧密相连，是美强化“三条岛链”建设中的新要素，还因为南亚有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对美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价值

的大国可供利用。

冷战结束以来，美印关系已发生戏剧性的重大变化，双方已从少有交往的冷淡关系演变成微妙而复杂的战略伙伴关系，彼此既有战略借重的需求，又存在战略利益的重合与冲突，还存在双方关系中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而美巴关系也在历经曲折和反复后演变成一种双方互有战略需要又有战略利益分歧的特殊伙伴关系。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印度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都显著上升；巴则因美发动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也提升了其对美的地缘战略价值。更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印与东南亚的区域性合作逐步发展。美出于地缘战略考量，对上述背景演变自然不会忽略，而会为其战略利益所用。美对南亚的主要战略意图在于：

首先，从当前大国关系角度看，印度是“金砖四国”和中俄印三国这两个代表新兴大国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双重身份成员。美国刻意拉拢印度并大力提升与印战略伙伴关系，既可对这两个尚处于初创阶段的新兴大国之间的重要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产生分化和制约作用，又可对中国形成战略制衡的压力。

其次，美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惯用大国相互制衡战略，以谋取于自身有利的地位，乃至主导地位。从中美俄印四方战略博弈角度看，美拉拢印，既可以印制华，又可以印制俄，从而不仅分化了中俄印三边合作关系对美形成的战略牵制，而且还可抵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美产生的战略压力。

其三，从印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力看，近年来，印不仅提升了其对南亚的传统影响力，还将其影响扩大到了

东南亚和中亚，乃至东北亚，从而使其对亚洲的总体影响力保持上升态势。而这正是奥巴马新亚洲地缘战略中对印需要借重之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2010年9月20日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演讲中就明言，“我们将印度视为一个东亚国家，我们在朝鲜等问题上与他们接触，因为我们知道印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四，美巴关系的地缘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巴基斯坦对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略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不可替代；二是美巴发展特殊伙伴关系不仅可制衡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还可制约中国对南亚影响力的扩大；三是美同时发展与印巴的关系，既可对印产生牵制作用，又可在印巴之间左右逢源。

### 其战略背景

随着世界两极旧格局的解体和世界多元新格局的曲折演进，国际形势中有两大趋势不断发展深化，不可逆转。一是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关系日益融合化的趋势不断发展深化，不可逆转；二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多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深化，不可逆转。总体而言，美对前者不仅接受且积极推进，设法利用。因为美国在经贸金融领域拥有超强的总体优势，占据着十分有利的地位，所以从中获益匪浅。但对后者，美则处心积虑地反其道而行之。因为，美仍坚持认为，世界两极格局解体以来，他们仍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一览众山小”的独超优势地位，所以美能够利用这一战略机遇期，重塑由美主宰的国际政治新格局。

迄今，美谋求霸权的心结依然体现在其全球战略中，而且仍在为此孤注一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10年9月8日在美国外交学会发表讲话时说：“伴随着当今世界的复杂性以及各国之间的联系，产生了一个新的美国时刻，这是一个对我们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的时刻。”“这是一个通过艰苦努力和大胆决策必须抓住的时刻，以便为今后数十年美国保持持久的领导地位奠定基础。”她还宣称，美国在全球的领导作用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在新世纪中，美国“能够、必须也将会”发挥领导作用，即便这么做时必须采用新方式。

但从当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看，美若为其今后数十年保持持久的领导地位奠定基础，既拥有相对有利因素，也面临重大制约因素。

#### 一、美国拥有的相对有利因素

(一) 从国际主要力量对比格局看，美在未来相

当长的时期内仍可维持独超优势地位。这是美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和基本战略判断。尽管国际主要力量对比格局正在向多极化发展和演进，美在这一多极化的进程中，力量对比呈相对颓势，美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在相对下降，但这种变化在可预见的将来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力量对比格局中美的独超优势地位。正因为如此，美将这段对自身有利的时期视为可以重塑由美主宰的国际政治新格局的战略机遇期。

(二) 从国际主要力量的军事实力对比看，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可维持绝对优势地位。美对军事的投入在各国中遥遥领先。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军事开支约占世界总量的40%强。美国未来五年的军事开支很可能超过3.5万亿美元。2010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美国的世界利益和地位要求武装力量必须具备无与伦比的能力。”而美在最尖端的军事科技领域亦占据着最先进的制高点。因此，美的军事实力让世界其他主要军事力量难以企及。

(三) 从国际主要力量的软实力对比看，美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可维持相对优势地位。奥巴马政府正是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的软实力，在地缘政治中纵横捭阖，才成功将美自身战略压力向中国转移。由于中国国力的快速增强，不仅以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而且以印俄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都对中国的疑虑和戒心日益上升。这种对中国共有的防范心态促使他们增加相互之间针对中国的战略互动和战略借重。这不仅增加了中国的战略压力，也为美对国际主要力量关系的战略运筹增加了回旋空间，从而转移或减轻了美因占据独超地位而面临的战略压力。从亚洲地缘政治角度看，由于日、韩、印、俄及东盟国家对中国强大的防范心态上升，这些国家与美之间相互借重的战略互动明显上升。因而对美有利的战略机遇和回旋空间也相对上升。

## 二、美国面临的重大制约因素

(一) 从亚洲地缘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看，美对亚洲的总体掌控能力和影响力均呈相对下降趋势。虽然亚洲区域化合作进程面临诸多重大障碍，但亚洲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相互融合与依赖的趋势不断发展和深化，而对美的经贸关系和依赖性则呈相对下降趋势。区域合作机制的逐步加强和完善也意味着对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日益加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都在逐步发展和深化，从而促进了亚洲内部区域一体化趋势的逐步发展和深化。这一趋势

的发展和深化，势必导致亚洲总体对美经贸关系的相对弱化和对美依赖性的相对下降。

(二) 从欧洲地缘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看，美对欧洲的总体掌控能力和影响力也呈相对下降趋势。尽管欧盟在遭受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冲击后一体化进程再次面临诸多障碍，但欧洲对美关系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趋势仍将继续发展和深化。尤其是《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的一体化建设势将继续在曲折中逐步推进，而美在这一进程对欧洲的主导作用和地位也将不断被弱化。这已成为大势所趋。

(三) 从国际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看，美对国际多边机制的总体掌控能力呈相对下降趋势。近年来，随着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兴起及其影响力的逐步上升，以美为代表的传统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及其影响力的相对下降，国际多边机制内的力量对比也呈现出对美不利的重大变化。其主要变化是：在最大的国际多边舞台，美对联合国安理会的驾驭能力相对下降，在安理会“五常”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处理中，美受到的牵制增多；在国际经贸和金融领域，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最具权威性的多边机制的总体掌控能力相对下降，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权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对美的牵制力增强；随着新兴经济体在20国机制中的作用和地位的逐步提高，美在其中受到的牵制也将相应增多；在发达国家内部，美与欧日在全球治理、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权益分配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分歧严重，尤其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一直坚持改变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欧美之间这种冷战结束以来颇为罕见的战略利益之争不仅将从根本上削弱美元长期以来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占据的霸权优势，更重要的是，这种战略态势的重大变化还将导致美在发达国家中的主导作用呈下降趋势。

### 其战略影响

奥巴马政府推行的新亚洲地缘战略表明，美在其全球地缘战略中并未更重视美当前所面临的重大制约因素，而是仍然更重视美当前所拥有的相对有利因素，尤其是美当前在国际主要力量对比格局中的独超优势、在国际军事力量对比格局中的绝对优势和在国际软实力对比格局中的相对优势，仍然更重视美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能够维持这三大优势的战略机遇期，并且仍然更重视致力于发挥美自身优势的独特作用。奥巴马政府

推行新亚洲地缘战略也表明，美在其全球地缘战略中已呈现更加重视亚洲，并将地缘战略重心逐步由欧洲向亚洲倾斜的新态势。这一重大的战略性举措对当前和未来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对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地缘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会直接产生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

### 一、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演进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近年来，东北亚地缘政治形势也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不断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尤其是经济区域化的不断演进使本地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关系日益密切，互相依赖性不断扩大和深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冷战因素依然挥之不去，冷战时期遗留的地缘政治格局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尤其是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政治军事对立的旧格局依然如故，而美与日韩不断强化同盟关系的冷战思维和地缘战略则已成为东北亚地区难以改变冷战遗留地缘政治格局的关键所在，成为最主要的负面因素和障碍。

其一，美若不断强化与韩日的军事联盟，联手加大对朝制裁压力，势必引起朝的强硬抵制和对抗，甚至铤而走险，导致美韩日与朝关系陷入新一轮施压与反施压、制裁与反制裁的恶性循环，使朝鲜半岛局势难以走出紧张动荡的阴霾。

其二，给六方会谈的前景增添新的变数。朝方不会在美韩日对其制裁和施压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被迫复谈，中方也更难在美韩日与朝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促成复谈。如果六方会谈机制在未来不能发挥作用，而美韩日与朝关系又持续紧张，那么不仅朝鲜半岛局势会陷入紧张动荡，而且会对整个东北亚局势的和平与稳定造成新的重

大冲击。

其三，美强化与日韩的双边军事联盟关系，并推进美日韩三边军事协调合作关系发展，不仅巩固了美对日韩的主导地位，而且还对正在发生积极变化的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带来了重大负面影响。最明显的是，使日韩重蹈“脱亚入美”历史覆辙，并催生新的冷战格局。尤其是“天安号事件”和“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以来，美与韩日之间加强战略互动，频繁举行所谓的针对朝鲜的军演，而其实质却旨在向该地区其他国家炫耀武力，进行战略威慑。此举在东北亚地缘政治形势演变中又注入了新的冷战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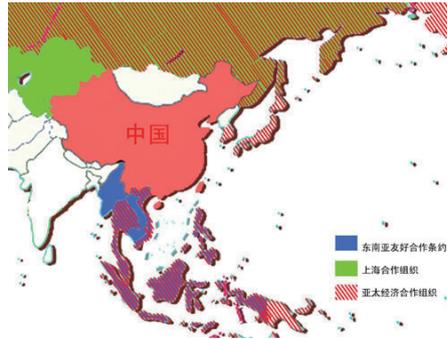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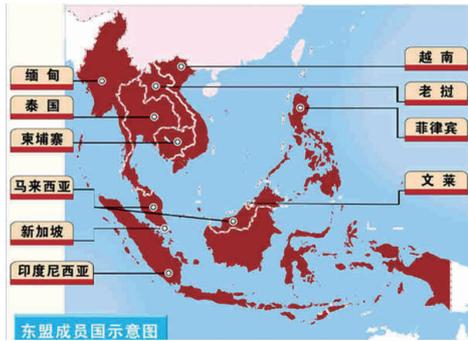
其四，美刻意强化和扩大“三条岛链”建设，重蹈冷战历史覆辙，对中俄朝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势必引起抵制和对抗。若出现这种局面，对中美俄日韩朝总体关系的良性战略互动和健康发展都将产生新的重大制约，乃至增添新的竞争和对抗因素。

其五，美刻意强化与日韩军事联盟作用，势必对尚处于初创阶段的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进展形成新的重大制约，并有可能出现中日韩经济合作关系与美日韩军事联盟关系相互制约的畸形关系。在这种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中，战略利益受损的是中日韩三方，而获益的则是美方。因为在中日韩互制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日韩对美的依赖性会上升，而美的主导作用则会进一步强化。

### 二、对东南亚地缘政治形势的演变增添新的竞争和冲突因素

近年来，东盟与中日韩在区域化合作进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实质性进展。尤其是2010年东盟与中国如期开创了自贸区运作的新型合作机制，不仅为双方在深入发展经贸领域的合作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双方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协调与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面对东南亚地缘政治形势中出现的这种新态势，美国的失落感明显上升。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力图扭转这种对美不利的被动局面，因而不断加大对东南亚地缘政治的投入和介入，以制约和逆转这种新态势的继续发展。此举对当前和未来东南亚地缘政治形势演变所产生的重大负面影响主要在于四个层面：

一是奥巴马政府完全改变了其前任在东南亚地缘战略中所采取的收缩态势，不仅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还跻身东亚峰会。这一新的战略举措表



化和扩大的深刻内涵。其战略影响主要在于：

（一）使印度与中国关系中的竞争和摩擦因素上升。美不断强化与印战略合作关系，尤其从军事上提升其实力，试图将印塑造成制衡和围堵中国的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此举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使印在与中国的边界谈判中趋于强硬，

还使印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采取排斥和对立立场。

（二）使巴基斯坦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受到牵制。美借强化与巴进行反恐合作，对巴从军事和政治上进行实际控制，以牵制中巴战略合作关系深入发展。

（三）通过强化美印战略合作关系，削弱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快速，影响力也随之扩大。美强化与印战略合作，加大对南亚的投入既扩大了自身影响力，也对中国的影響力扩大产生制约。

（四）美与印不断强化在印度洋的军事合作，不仅强化了美在该战略性海域的军事存在，还对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在该区域的海上运输合作形成重大牵制，也对中国通往中东的海上航线构成潜在威胁。

（五）美扩大和强化在南亚地缘政治中的存在和作用，对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具有复杂深刻的战略影响。对印度而言，与美发展战略合作关系是把双刃剑。此举既可提升其实力和影响力，又可对形成战略制衡。但与此同时，其谋求南亚主导地位的传统地缘战略势必与美的南亚地缘战略形成新的结构性矛盾。而美巴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与深化则不仅对中巴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和深化形成制约，也对美印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和深化产生新的战略互制效应。

（六）总体而言，南亚地缘政治中的多边关系将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战略竞争因素将显著上升，对多边和区域合作将产生新的重大制约。首当其冲的就是尚处于初创阶段的中俄印三边合作关系，以及已与南亚地缘政治相关联的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合作机制。因为，美国是不会接受将其排除在外的这类多边合作机制对其形成战略性牵制的。因此，对其进行分化和反牵制无疑是美地缘战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明，美将不断加大对东南亚地缘政治的投入和介入，从而增强美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并进一步提升美对该地区事务的掌控能力。因此，可以预料，未来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中会呈现更加错综复杂的多边博弈关系，从而增加了处理地区事务的难度。

二是美刻意介入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处理，并强化美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不仅不利于该问题的妥善解决，还会使该问题的解决复杂化，增添新的矛盾和冲突因素。

三是美拉拢东盟国家并使之成为美强化“三条岛链”建设的参与者，不仅具有削弱中国在东南亚逐渐增强的影响力的作用，而且具有“战略围堵”中国的作用。尤其引人关注的是，美恢复了已中断多年的对印尼军方的军援，强化了双方军事合作关系，并派出一个航母战斗群与越南在南海举行了史无前例的联合军演。奥巴马政府的这一重大战略举措反映出其新亚洲地缘战略中对华在军事上的“战略围堵”态势在进一步强化。如果这一态势在未来继续发展，它不仅会导致中美关系中竞争和冲突因素上升，而且会严重干扰中国与东盟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和深化，进而对整个东亚合作进程形成重大制约。

四是美已发起了“湄公河流域合作倡议”并正加紧“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此举势必对正在发展以东盟为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产生对冲作用，尤其是造成东盟在东南亚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下降，并给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未来前景增添新的变数。

### 三、对南亚地缘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产生新的重大冲击

奥巴马政府将南亚作为其新亚洲地缘战略中对东北亚和东南亚这两个战略环节的新的延伸和扩大。这一重大战略举措既反映出美对亚洲地区的存在有强化和扩大的新态势，也反映出美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在强

# 奥巴马政权下的日美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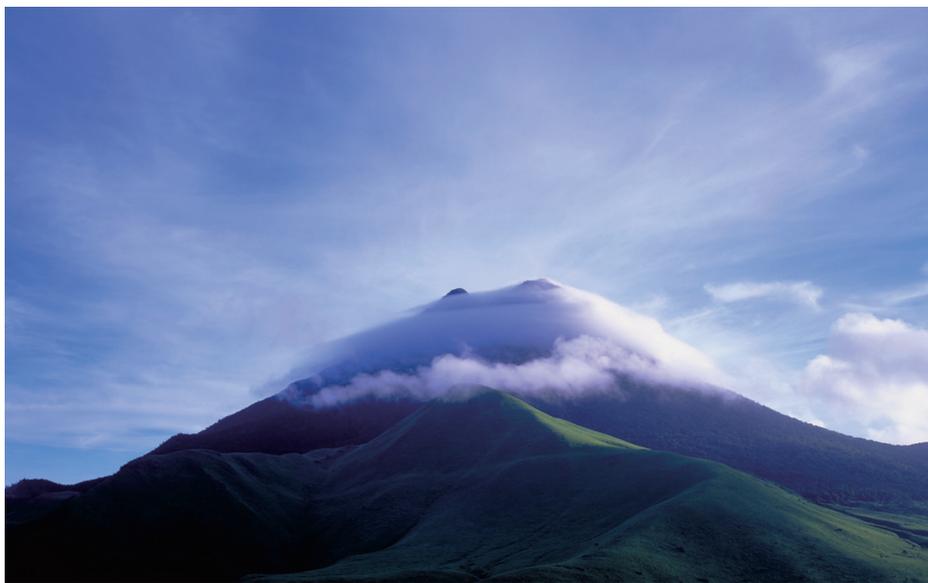
## ——日本民众及舆论对奥巴马政权的评价<sup>1</sup>

宋金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

从奥巴马参加总统角逐到大选获胜，日本国内可以说对奥巴马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注。2008年11月奥巴马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当时日本的舆论调查显示，80%的日本国民认为奥巴马年轻有为，有魄力，有行动感，能把握时代潮流，获胜是好

事，对奥巴马新政权表示欢迎。<sup>2</sup>但政界、学界以及企业界则对奥巴马的上台感到担忧。9·11事件以后，布什政府以反恐及消除大规模杀伤武器为借口先后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日本作为同盟国，除了像海湾战争一样为美军巨额战争费用买单以外，还积极提供海上供油等军事援助，日本紧随美国，亦步亦趋，提供帮助，日本愿意，美国高兴，两国关系相当融洽。以“变革”现状为口号获胜的奥巴马政权上台以后，日美关系是否会受影响，令日本感到不安和忧虑。

一些保守媒体认为，“奥巴马政权偏重中国”，“民主党政权会走贸易保护主义道路，对日本经济发展不利”，担心民主党奥巴马获胜，会使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形成的良好的美日关系出现恶化。<sup>3</sup>2008年11月读卖新



闻与盖洛普共同调查显示，只有28%的日本人认为日美关系会变好（美国为50%），日本政府官员也认与中国相比，奥巴马更愿意接近中国，在经济上会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不如共和党好打交道，对日本经济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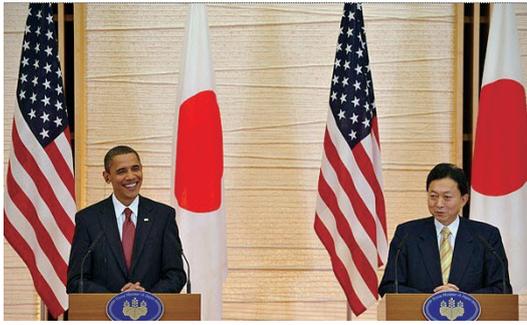
因此，日本国内不仅对奥巴马如何克服共和党执政时期留下的一大堆国内问题感兴趣，对其外交政策也格外关注。奥巴马政权的一系列举措，包括从总统就职演说，应对金融危机各项措施，宣布有计划从伊拉克撤军、增兵阿富汗，到医疗保险改革法以及金融监管法的通过，日本媒体无不给予海量报道。和美国一样，在2010年2月奥巴马就职一周年以及2010年11月份中期选举之际，日本各界对奥巴马政权的评价和政治前景的预测成为热门话题，各种报道、研讨和分析充斥坊间媒体。

日本之所以对奥巴马如此关注，还与日本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有关。2009年11月日本民主党打破自民党50多年的统治上台执政开始，就着手纠正自民党时代一味追随美国的战略，鸠山内阁（2009年9月16日—2010年6

1 本文为作者在“美国中期选举与奥巴马执政前景暨美国的亚洲政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 2008年11月8、9日，朝日新闻社实施的全国世论调查（电话）。<http://www.asahi.com/special/08003/TKY200811100245.html>.

3 <http://opinion.infoseek.co.jp/article/232>.



月2日)提出了建立“对等的日美关系”，构建设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共同体”的

构想，引起了美国的不满，两国关系开始疏远、转冷，日美关系的矛盾和不确定性增加。日美普天间基地矛盾激化以后，背负众望、以历史上第二高支持率上台的鸠山内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不得不在四面楚歌中被迫辞职，这是日美关系矛盾加剧的表现。如何处理日美关系，包括解决美国驻军问题，不仅成为考验新上台的菅直人内阁的课题，也是检验日美同盟以及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格局走向的重要指向标。日本媒体和舆论对奥巴马政权格外关注，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通过日本民众对奥巴马政权的看法，探讨奥巴马上台以后日美关系的现状。

## 一、奥巴马的亚洲外交战略与日美外交冲突

经过安倍、福田、麻生以后，日美关系已经远不如以前小布什和小泉时代紧密，奥巴马上台以后，两国政府关系的热度下降更快。2009年2月麻生访美前，美国派希拉里访日，日方曾根据希拉里的要求以总统夫人身份安排与皇后喝茶，给希拉里破格待遇，但麻生作为日本首相第一次访美与奥巴马举行首脑会谈后，白宫以公务繁忙为由拒绝了日本外务省要求举行两国首脑共同记者招待会的请求。<sup>4</sup>日本人认为，这是美国不重视麻生政权的表现。相映成趣的是，2009年11月13日奥巴马访日，在天皇御所会见天皇和皇后时向后者行近乎直角的最高礼的照片曝光以后，美国舆论哗然，认为大总统对别国君主如此低头，有失美国大总统的身份，让美国人颜面尽失。这两个事件虽然性质不同，却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奥巴马上台以后，日美之间的隔阂增加了。

对于经过鏖战艰难获胜的奥巴马政府而言，最紧迫的是要处理好前布什政府留下的诸多国内和国际问题，包括伊阿战争、解决金融危机、恢复经济秩序、制定气候变化对策、遏制核不扩散等，兑现自己的大选承诺，给选民留下良好的印象。相对而言，日美关系总体基本平稳，不存在需要紧迫处理的问题。在涉及日美关系时，奥巴马只是表示重视日美关系，要强化日美安保同盟，并无实际明确的内容。对于日本政府的担忧，其主管亚洲政策的下属，包括原驻日大使Thomas Foley以及Walter Mondale、国防部原日本部部长Derek Mitchell等也都表示，美日同盟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日本国内却认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优先考虑的是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与共和党相比，民主党政权对日本和亚洲的重视较少，难以抹去内心的不安和忧虑。

2009年11月14日，奥巴马访日，在东京举行的公开演讲中，首次阐述了美国的亚洲外交基本政策。他指出，日本一直是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重要合作对象，美国是面临太平洋的“亚洲太平洋”国家，美国的将来与经济高速发展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日同盟是两国关系的基础，表示美国愿意积极参与亚洲太平洋地区问题的解决，在该地区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处理亚洲国家的关系上，对北朝鲜，希望其早日回到六方会谈上来，不要从国际上孤立，愿意看到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得到解决，早日恢复与邻国的正常关系。奥巴马在强调日美同盟将作为“两国安全和繁荣的基础”继续保持下去的同时，也提到了要加强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21世纪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就能解决的，欢迎中国在世界范围问题的解决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还表示“美国没有封锁中国的意思，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不会减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奥巴马的讲话一方面让日本吃了定心丸，感到美国需要日本，奥巴马时代两国大局不会发生重大改变，可以稍微放松紧绷的神经，但同时也让日本感觉到将来有可能夹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被大国外交所架空，日后处境会越来越难，内心不免生出些许苦涩和酸楚。

这种感觉因加入了日本自己的因素变得越发沉重。

<sup>4</sup> 及川正也·川上克己「日米首脳会談：共同会見空振り、米メディアも反応冷ややか」毎日新聞社2009年2月25日。

2009年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被赶下台，以鸠山由纪夫为首的民主党联合反美的社会党和国民新党组联合政府执政以来，对自民党时期对美政策进行了大幅修改，提出“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sup>5</sup>退出为美军提供印度洋海上供给补助活动，<sup>6</sup>提出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共同体”设想等，<sup>7</sup>这些引起了美国的不满。

2009年11月14—23日读卖新闻与盖洛普共同进行的美日舆论调查显示，民主党鸠山内阁上台以后，日本国民认为日美关系会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只有17%，有16%的人认为会出现恶化。<sup>8</sup>

实际情况也是基本如此。在普天间基地转移问题上，美方坚持按协议办事，让鸠山内阁陷入要么维持美日关系，按计划将基地搬迁至冲绳的名护市，要么遵守大选时承诺，满足基地居民的要求，将基地搬出冲绳或日本的两难选择，最后，鸠山因参议院选举在即，从维护大局出发而宣布内阁总辞职。<sup>9</sup>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美日两国的看法却令人惊奇地保持一致。2010年6月22日《产经新闻》发表题为“日美安保修改50周年，提高共同防卫实效”的社论，认为鸠山前政权没有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安全局势，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迷失了方向，终结了印度洋上的供油活动，给日美同盟投下了阴影。社论指出，在北朝鲜发展核武、导弹试验以及中国核武器、海军力量增强，威胁增加的情况下，亚洲太平洋地区美中主导权的争夺将愈加激烈，日本与美国有自由、民主等共同的价值观，维持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比以往更加重要，日本不能站错队伍，应该和美国一道，在维和、援助和打击海

盗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其他日本国内舆论也都大同小异，不仅不把矛头对外，反而认为是自己选出的鸠山内阁出尔反尔，鸠山下台，是咎由自取，美日关系受损，主要责任在鸠山。

有调查显示，对于两国关系在奥巴马、鸠山执政期间恶化的问题，美国民众大多并不甚清楚，没有更多的感触，认为日美关系基本没有改变。普天间基地矛盾激化以后，由于美国态度强硬，美国国内也担心日本国民是否会报复。有调查显示，鸠山上台以后，日本对美日同盟的支持率和对美好感基本没有变化，而鸠山的支持率却下降到20%以下。日本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内向，令美国政府松了一口气。

有趣的是美国方面的看法。美国国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是，<sup>10</sup>虽然奥巴马有对同盟国比对立国更冷淡的一面，美方对日态度和立场有问题，但美国冷遇日本，责任在鸠山内阁。因为奥巴马认为，鸠山内阁偏右。《产经新闻》还引用美国方面的报道称，美方认为鸠山内阁“没有把强化核抑制力作为重点”，长此以往，“日美关系将比卢武铉时期的美韩关系还要差”。由于鸠山内阁的做法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国内重视日美同盟的论客也并没有批评奥巴马政权的对日政策，而是希望美方忍一下，不要过于施加压力，使日美关系大局受到更大的损失。

也许由于以上原因，2009年9月24日鸠山首相首次访美，在纽约市内与奥巴马进行的首脑会谈也主要是以建立两国领导间的信赖关系为主，双方都没有提到日本在2010年1月将停止印度洋上的供油，修改日美地位协议，

5 在民主党的选举纲领中，包含了“为了实现对等的Ribeiro关系有必要对日美地位协议进行修改”的内容。公家邦彦指出，对美国而言，美国希望的对等关系是日本提高自主防卫的努力，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与民主党的对等概念相去甚远。

6 日本宪法规定，日本不能向国外派出自卫队参加军事作战活动，伊拉克战争开始后，为援助美国的军事作战，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小泉执政期间，通过修改法律，实现了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为在印度洋航行的美国军舰等提供供油等补给活动的外海派兵目标。

7 冈田外相在日本国外记者协会的讲演中指出，“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范围是“日本，中国，韩国，东南亚各国，印度，澳洲，新西兰”，没有提到美国，这就意味着把美国排除在亚洲共同体之外，对中国有利。而这与美国不允许在亚洲出现霸权的国家的战略相矛盾，对美国来说是难以容忍的。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是导致日美关系变冷的重要原因。但2010年6月1日鸠山辞职前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指南中，加入了“加强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具有高度开放透明度的地区合作”，“美国的介入是不可缺少的”等内容，明确提出不排除美国。

8 2009年11月14—23日读卖新闻与盖洛普共同进行的美日舆论调查。

9 2010年5月28日，鸠山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政府将把普天间基地转移到同属冲绳县的边野古的声明，并罢免了社民党党首、福岛大臣的职务，宣布以政治生命为赌注，继续减轻冲绳居民的负担，但6月2日就宣布内阁总辞职。

10 米タフツ大学フレッチャー法律外交大学院のダニエル・ドレズナー教授の『オバマの日本冷遇は誰も責めない』（原題：How Valid is the Ally Critique?）

在日美军基地搬迁等问题，只是务虚地表示，将以日美安保50周年为契机，深化日美同盟关系，继续把“日美外交作为基础”加以重视。两国首脑初次会谈只进行了短短的30分钟就草草收场，令日本媒体大为感叹日美关系今非昔比。

## 二、普天间基地问题对日美关系的影响

普天间基地位于冲绳群岛宜野湾市普天间市中心，面积约占该市面积的25%，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最大规模的武装直升机机场，有100多架直升机。基地周围住宅、学校等民用设施密集，由于安全和噪音等问题，当地一直要求返还这一基地。1995年，驻冲绳美军士兵强奸少女事件在冲绳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对美军基地运动，日本全国各地也举行各种规模的抗议集会。为平息这一浪潮，日美两国政府进行了多次协商。在1996年12月举行的日美安全保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冲绳美军基地问题的最终报告和普天间机场问题的附加文件。双方同意在以后的5至7年里建成充分的替代设施，在可以投入使用后归还普天间机场。日本自民党政府提出在冲绳县名护市建设美军海上航空基地，但遭该市大多数人反对，替代机场一直没有动工修建。此后10年间两国就普天间机场迁址问题一直争执不休。

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联合政府要上台执政。此前民主党一直表示要将普天间基地转移至冲绳县外或国外，但上台后却在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而社民党对普天间基地原转移方案表示强烈反对。美方则要求日方执行原有的转移计划，称普天间基地不转移，驻日美军就不会进行整编。日美关系因此产生波动。<sup>11</sup>

由于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造成社民党退出



联合政府等政局混乱局面，鸠山引咎辞职。民主党副首相菅直人出任新首相。为了避免悲剧重演，菅直人上任以后（2010年9月6日）马上与奥巴马打电话沟通，表明将遵守日美协议解决普天间问题。为了打消新政权亲中的猜疑，菅直人还取消了去中国参加世博会的计划，而于9月25日在加拿大举行的8国首脑会议上首先与奥巴马进行了会谈。在2010年8月举行的参议员选举中，菅直人提出新政府在外交、安保方面将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走现实路线。在普天间地基迁移问题上，沿袭2005年5月份日美协议，<sup>12</sup>同时重视与韩国、澳洲以及印度的防卫合作，加强对太平洋地区的控制权和领导力。

虽然新政府希望努力挽回鸠山内阁在日美关系上的失策造成的影响，但普天间基地问题仍像悬挂在日美关系上的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危险并没有消除。当时日本舆论认为，假如2010年秋天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反对县内迁移派获胜，普天间基地争论会重新燃起，政府不可避免地将面临一场政治抉择。如果处理不当，菅直人内阁也难以坐稳。

11 顾德伟 背景资料“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2010年5月28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5/28/c\\_12152903](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5/28/c_12152903)。

12 2005年日美两国在2+2政府会谈中达成了“日美共同战略目标”共识，即建立共同防卫弹道导弹体制，探讨共同作战计划，提高两国军情报共享、合作和互通利用的水平，确保日美防卫协议的实效性。根据此次会谈精神，2006年5月，日美两国就驻日美军整编达成最终协议，决定将普天间基地转移至冲绳县名护市的美军施瓦布军营沿岸地区。



用以及使命，亚洲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主主义体制的确立，日美经济关系和合作以及太平洋贸易自由化等因素，日本可能将把加强与美国以及亚洲同盟国的安保合作写入其中。美方也希望日方把奥巴马政权的亚洲战略囊括。

### 三、日本民众对奥巴马政权的态度

对奥巴马政府的态度，日本国内很不一致。在核问题上，奥巴马提出要建立无核世界，主张消减核武器，日本的反核团体以及原子弹受害地区期待着奥巴马能有所作为。但在伊阿战争以及普天间基地问题上，民众倾向于认为奥巴马、希拉里与布什时代一样，态度坚决，这令不少反对伊阿

战争、要求撤出美军基地的国民反感和不满。日本民众虽然对奥巴马重视加强金融管制，关心医疗改革等民生问题，对伊阿也不主张单边主义持欢迎的态度，但与奥巴马上任初期相比，日本民众对奥巴马本人的兴趣已经降低，美军基地矛盾暴露以后，日本民众对本国政府和美国都不抱太大希望，因此亲美和反美的态度基本没有变化。

当时有分析认为，奥巴马政权的未来有两种可能。如果美国国民认为经济好转，那么对奥巴马非常有利，由于执政有了结果，奥巴马以后还可能采取各种积极的环境政策、提高绿色环保技术的投入等。另外一种可能是，经济走势不好，增长乏力，雇佣不见起色，那么，奥巴马就会成为泄愤的对象。<sup>15</sup>

从整体上看，当时的日本媒体对奥巴马政权未来的分析和判断比较客观、冷静，认为从美国当时的近期趋势上看，由于美国经济恢复乏力，股价下跌，失业率居高不下，再加上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等发生，随着共和

对于美国而言，也不希望冒冲绳基地美军改变案出现变故的风险，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对日本政府采取了战略忍耐的态度。马萨诸塞州工科大学政治学部教授理查德·萨米尔认为，美国奥巴马总统与美国其他政权一样，仍然把日本作为太平洋地区安保的要地，美国对日本制定法律对美军进行援助以及派遣自卫队赴伊拉克表示满意，但随着美国力量的衰弱，以后可能无法对日本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同盟可能会出现两种变化，一是日本强化军事力量，脱离同盟；二是日本不强化军事力量，维持同盟。他认为，美国会继续维持同盟关系，但随着美国消减在日军事部署，日本可能要增加自主作战的能力。<sup>13</sup>

美韩东海军演以及中国南海问题出现以后，美国更加重视日本的作用，不希望太平洋战略均衡发生变化。一些亚洲周边国家，也不希望中国的影响过于强大。前菲律宾驻日大使认为，日本国民对安全保障的理解不足，政府没有起到说明的责任。<sup>14</sup>日前日本有媒体报道，日本正在编制中期防卫战略，考虑到两国防卫的相互作

13 リチャード・サミュエルズ＝マサチューセッツ工科大学政治学部教授。

14 売新聞連載記事【『普天間』破綻】(第5回＝ドミンゴ・シアゾン元駐日フィリピン大使)・6月4日付。

15 冷泉彰彦：「日米埋まらない認識ギャップ」2010年07月29日（木）<http://www.newsweekjapan.jp/newsroom/2010/07/post-131>。

党势力的反扑，中期选举将是一场肉搏战。有日本媒体引用华盛顿ABC新闻调查美国国内对奥巴马的支持率下降的报道，曾预计民主党在2010年11月份的选举中将失败。但2010年2月—3月外务省进行的美国对日舆论调查认为日美安保条约继续维持的占90%和86%，是1960年调查以来的最高，认为日美安保条约发挥了非常重要和重要作用的占81%和85%。当时的调查也显示，不管奥巴马政权中期选举是否获胜，日美同盟关系将继续下去，未来日美关系不会有大的改变。

#### 四、现实主义外交中的中日美关系

鸠山下台以后，日美同盟关系有所改善。菅直人内阁提出在综合安全保障、经济、文化等领域强化与美国的的关系，深化日美同盟，关于日美最大的悬案普天间基地问题，也表示将在日美协议的基础上进行解决，并呼吁国民共同讨论包括日美同盟关系在内的日本对外关系，走现实主义的外交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日美关系仍可能存在变数，但在美国一国独大的现状下，日美关系一边倒的格局很难有大的突破。

最后，简单谈谈日美关系中的中国因素。关于美中关系，日本媒体引用《纽约时报》的报道称，目前中美关系紧张主要是美国中期选举以及奥巴马希望连任的政策所导致的。报道介绍了美国国会有人想以中国操纵人民币、军事不透明以及大量出售美国国债对美国构成威胁等为由，把中国作为影响奥巴马政权选举的第二位重要问题，欲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因为奥巴马政权是以国内工会和劳动者阶层作为支持母体的，美国民

主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因此，对中国贸易赤字敏感，今后要求中国采取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强。<sup>16</sup> Oxford Analytica也分析认为，如果美国经济2011年有起色，中美关系可能好转，但要建立良好的关系很难，从总体上看，美国经济恢复的可能性小，中美关系将走向恶化。<sup>17</sup>

关于中日美关系，日本倾向于认为，中国越强大，威胁越大，随着最近美韩军演以及南海问题导致中美关系的恶化，媒体报道越来越偏向于认为日美安保和日美同盟是必要的。对于中国，日本一方面希望中国经济发展能恩泽日本，给日本疲惫的经济带来恒久的利益和活力，一方面担心中国的崛起对日不利；对于美国，日本一方面对美中G2大国地位的加强感到无奈，<sup>18</sup>一方面又希望能拉美压中。这种既有求于他人又欲反制他人的做法看似矛盾，但却很实用，让对方难以应对。这也是美国人惯用的伎俩。在对中问题上，日美一边合力围堵，一边强调重视中国，虽然在不同的问题上态度不同，但方式是一样的，且彼此之间心有灵犀，心照不宣，这就是日本所谓的现实主义外交的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普天间基地问题不是日美关系中的实质性的问题。事实证明，虽然奥巴马执政以后，日美之间存在的分歧有所扩大，日本民主党政权想纠正过去过度依赖美国的一些做法，甚至提出“日美关系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两国关系”，“美国一国独大的时代已经结束”，但不管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还是民主党的菅直人政权如何反对各自前政权的政策，只要美日都奉行现实主义外交，短时间内就不能对日美同盟关系有大的改变抱有任何幻想。<sup>19</sup>

16 2010年2月19日纽约时报Edward Wong文章。Rift Grows as U.S. and China Seek Differing Goals. <http://www.nytimes.com/2010/02/20/world/asia/20china.html>.

17 <http://www.sankeibiz.jp/macro/news/100126/mcb1001260506008-n5.htm>.

18 2010年2—3月外务省进行的美国对日舆论调查。一般国民认为亚洲最重要的国家是日本和中国的同为44%，但专家中有36%回答是日本，56%认为是中国。这令日本舆论相当紧张，担心亚洲的中心被中国取代。

19 宫家邦彦认为，鸠山提出的“对等的日美关系”，“主体外交战略”，包括：“修改关于日美地位协议”、“美军改编以及在日美军基地的重新思考”、“构筑东亚共同体”，这些都对美国不利，使日美关系陷入冷淡。鸠山在处理普天间基地问题上过于急躁，其外交是理想主义的外交战略，他的主张意味着自民党时代的日美关系是不平等的，日本外交不是主体外交。而美国人则认为，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但在安保方面却想“搭不花钱的便车”，这对美国不公平。要求日本强化安保方面的力量。菅直人内阁上台以后，提出将在综合安全保障，经济、文化等领域强化与美国的的关系，深化日美同盟，关系日美最大的悬案普天间基地问题，表示将在日美协议的基础上，尽量减轻冲绳的负担，但同时也延续了鸠山内阁的提法，一是保留了就是在紧密对等的前提下修改日美地位协议，同时为实现东亚共同体，加强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各国的信赖关系。但对于军事力量迅速发展的中国，要求增加国防政策的透明度，开展范围交流，同时在2010年的防卫大纲中，强化与澳洲、韩国和印度等的军事合作，以应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日本的影响。

# 爱尔兰中国研究调查报告（1979—2009）<sup>1</sup>

王展鹏、孙冲、刘茵雅<sup>2</sup>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摘要】** 调研表明，从历史上看，爱尔兰中国研究存在研究成果数量有限、研究领域集中在历史维度的西方汉学研究议题（如英国殖民时期爱尔兰裔英国人、爱尔兰传教士在华活动），对当代中国问题的了解主要借助英、美等其他西方国家出版物的特点。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爱关系的深入发展，爱尔兰的中国研究在传统领域的基础上，开始呈现出注重当代中国现实问题，并积极探索爱尔兰中国研究学科身份的新趋势。我国注重对外文化传播、增强国家软实力战略与爱尔兰亚洲战略的互动是促成这一积极进展的重要因素。

## 一、研究意义

爱尔兰虽是一个西欧小国，但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日益增强，中爱关系也出现了良好发展的势头，学术文化交流日益紧密。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主要关注美、英、法等西方大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对爱尔兰中国研究历史和现状的了解还几乎是一片空白。爱尔兰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经历，学术研究既有西方主流传统的印记，又有其鲜明的特色。其后殖民经历中关于世界与民族、现代与传统、全球化与民族独立及国家建构等命题的思考，在看待中国的过程中，赋予了其既不同于西方大国又不同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特视角。因而，这一课题是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无论在经验数据的积累还是学理的探索上都有重要意义。

## 二、爱尔兰中国研究的基本情况

### （一）爱尔兰中国研究的基本认识

两国建交前，爱尔兰中国研究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表现出研究领域狭隘、注重历史研究而对中国的现实关注不够、研究人员和机构数量有限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爱尔兰曾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统治，其主流文化和思维方式表现出既有欧洲殖民者心态的一面，又有要求民族独立的诉求，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英帝国的主流话语。尽管爱尔兰于1922年开始独立建国，但



由于历史原因，爱尔兰在贸易、投资等领域长期依赖英国，对除英国和有大量爱尔兰移民的美国之外的国家缺乏足够的关注，形成了其在看待外部世界过程中的孤立主义传统，1973年加入欧共体后，爱尔兰对外关系的重心转移到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研究仍相对不足。除爱尔兰对外关系中的小国心态外，爱尔兰由于使用英语作为事实上的主要官方语言，长期与英国社会文化联系紧密的状态也使爱尔兰人更多地借助英国的出版物了解中国，降低了独立开展中国研究的动力。

1979年，中爱建交后，中爱关系取得了长足进步。两国政治关系发展良好，双边贸易额从515万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70.7亿美元。爱尔兰在华投资始于1989年，目前已有300多家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一些中国公司也在爱尔兰设立了办事处或欧洲地区总部。中爱民间交往日益频繁，在爱中国留学生已超过一万人。两国互利合作

1 本研究报告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信息汇总资助项目结项成果。

2 本报告主要由王展鹏执笔完成。孙冲（北外爱尔兰研究中心硕士生）、刘茵雅（爱尔兰国立大学梅努斯哲学系博士生）承担了爱尔兰中国研究机构部分资料搜集和撰写工作，孙冲还负责有关文献的格式、体例整理工作。

的深入为爱尔兰中国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爱尔兰通过参与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实现经济起飞，由当时欧盟最贫困的国家上升为按人均GDP计算的欧盟第二富国，爱尔兰人开始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认识世界并重新界定自身民族身份的进程。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与爱尔兰的政治、经济、社会交往日益紧密，为爱尔兰中国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因此，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爱尔兰中国研究发展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界，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1998

年爱尔兰政府提出以中国为重点的亚洲战略，两国领导人的高层互访和我国在爱尔兰资助孔子学院建设都为爱尔兰中国研究的发展注入了动力。中爱建交的前20年，爱尔兰的中国研究基本上沿袭了其历史发展的轨迹：研究课题注重英爱殖民时期爱尔兰人与中国交往的历史、爱尔兰传教士在华活动等一些传统议题，研究人员分散，缺乏专业研究机构。

但近十年来，爱尔兰中国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开始表现出研究问题领域更加广泛、注重爱尔兰中国问题研究的特色和学科身份、与中国学术界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增强的特点。特别是我国政府在爱尔兰资助建立的两所孔子学院与爱尔兰相关高校建立中国研究院的努力相契合，为爱尔兰中国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

## （二）有关文献

### 1. 中爱关系研究

如前文所述，历史上爱尔兰中国研究规模较小，加之英爱特殊关系的限制，其研究成果以爱尔兰人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为主，而对中国的一般了解则主要借助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出版物。因此，爱尔兰中国研究的热点



是英国殖民时期爱尔兰人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和爱尔兰传教士在华活动，双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则在两国建交后，特别是近十年来才开始引起爱尔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尽管这些领域正式出版的研究成果仍十分有限，但在相关领域教学、基础研究的积累方面已出现积极变化，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 1) 英国殖民时期爱尔兰人在中英外交史上的作用研究

这一研究领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课题是关于担任清朝总税务司长达40年（1854—1908）的爱尔兰人罗伯特·赫德爵士在华活动和首位出使中国的英国大使马戛尔尼伯爵觐见乾隆皇帝的史实。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长期

存在爱尔兰人复杂的身份认同的命题，<sup>3</sup>事实上，英美主流学者的相关研究一直将赫德和马戛尔尼称为英国人，<sup>4</sup>因而，爱尔兰学者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以一种开放的多重认同观来认定他们的爱尔兰身份。例如，虽然赫德爵士的正式身份是一位英国公民，但爱尔兰学者往往强调他出生于北爱尔兰阿马郡的中产阶级家庭背景、毕业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经

历，赫德爵士本人也在不同场合将自己称为英国人、英格兰人和北爱尔兰人。而马戛尔尼伯爵的爱尔兰身份则主要源于他来自安特里姆郡并担任过爱尔兰国务大臣的经历。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英国外交史上的问题仍是爱尔兰中国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不断有新的著述出现。例如，Roebuck撰写了马戛尔尼的新传记，而关于赫德伯爵与中国的研究则不断深入。200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亚洲研究》杂志刊登了一组关于赫德伯爵与中国的文章，分别从赫德对中国海关制度发展、官方统计制度的贡献、赫德与义和团运动等方面做了专题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爱尔兰女王大学理查德·奥里里博士撰写的《罗伯特·赫德在中国：他的爱尔兰血统的

3 Jerusha McCormack, *China and the Irish*, Dublin: RTE, 2009, pp. 3-4.

4 有关研究如Katherine E. Bruner, John K. Fairbank, and Richard J. Smith eds., *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6; Helen H. Robbins, *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George, Earl of Macartney*, London: John Murray, 1908.

重要性》一文。在该文中，针对费正清等历史学家将赫德在中国取得的成功归结为他具有在不同文化间左右逢源的能力的观点，奥利里博士进一步提出赫德的爱尔兰血统是这一文化亲和力的重要根源，爱尔兰民族历史形成的多重身份的复杂性、注重家庭、关系乃至多少有些裙带作风的传统和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因素产生了共鸣。<sup>5</sup>与英国主流话语中的居高临下的殖民心态的解读不同，这里赫德的形象不再是一位文明的西方绅士在教化东方人，而是更多地以平等的心态融入了中国社会。如前文所述，爱尔兰历史和文化经历的复杂性使其文化心理中既有昔日大英帝国殖民者的因素，又有被压迫民族追求平等的愿望。对这一特性的分析、解读也成为爱尔兰传统中国学研究中探索自身学科身份的一个新取向。

## 2) 爱尔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研究

爱尔兰传教士在华活动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爱尔兰中国研究的热点问题。爱尔兰一直是欧洲最虔诚的天主教国家之一，天主教信徒占其总人口的近90%，而在新教派别中源于英国国教的爱尔兰国教会（又称爱尔兰圣公会）也在爱尔兰宗教事务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爱尔兰天主教在华活动是我们收录的关于爱尔兰中国研究资料最为丰富的一个主题（共计10件/篇），形式多样。目前，在都柏林可以查阅1917年圣高隆庞会理事会会议记录、1918年开始发行的该会杂志《远东》的有关文献、圣高隆庞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先驱爱德华·葛尔文、约翰·布罗未克神父的通信，学术界对此的相关研究也从未中断。<sup>6</sup>自两国建交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这一领域不断有高水平的著作出现。例如，爱尔兰神职人员伯纳德·史密斯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中国传教会——梅努斯中国传教活动的起源》一书追溯了圣高隆庞会的先驱们在中国筚路蓝缕奠定传教活动基础的历史。<sup>7</sup>而爱尔兰国立大学梅努斯利用当地作为对华传教活动发源地的地域优势组织了一系列研究和教学活动。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成果是该校历史系于1998—2006年间组织完成的圣高隆庞神父在远东传教活动口述史项目。该项目采访了100多位二战前后在中国、韩国、缅甸、菲律宾等国传教的爱尔兰传教士，制作了录音和文字稿，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sup>8</sup>此外，尼尔·柯林斯神父利用有关档案和访谈，在爱尔兰国立大学梅努斯历史系完成了博士论文，对1916年葛尔文神父来华到1954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圣高隆庞会撤出中国近四十年间该会传教士在中国（汉阳、南昌、湖州）、菲律宾、韩国、缅甸的活动作了梳理，其中大部分为关于中国的内容。该书于2009年出版。<sup>9</sup>

爱尔兰新教派别在华活动近年来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这些派别主要包括爱尔兰圣公会、长老会、循道宗等。其中，与传统西方传教运动研究的观点不同，<sup>10</sup>爱尔兰学者注意到自19世纪中期以来，威廉·罗素、莫洛尼、欣德、柯蒂斯等几任爱尔兰裔爱尔兰圣公会/英国国教会主教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教会走上一条独立自主、自我发展的本土化进程，充当传统天主教和其他新教教派之间的桥梁作用。爱尔兰自身争取民族独立的经历在这些爱尔兰主教的思想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遭到英国国教会和部分在华西方传教士的抵制，他们仍不断努力推进中国基督教本土化和各教派间的联合运动，由中国神职人员取代西方传教士担任教会领导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为新中国成立后统一的中国基督教协会和基督教三自爱国在观念和组织了准备。<sup>11</sup>

## 3) 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

总体来说，两国建交以来，除两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报告、爱尔兰主流媒体新闻分析评论、企业界的商务报告外，关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学术研究成果有限，但在2005后，随着都柏林大学中国研究院暨孔子学院、科克大学的中国研究院和孔子学院的相继成立，中爱关系开始成为这些研究机构设立、举办学术研讨会、

5 O' Leary Richard, ed., "Robert Hart in 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Irish root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ume 40, Issue 03, 2006.

6 如John Blowick, "The Maynooth Mission to China", in *The Catholic Truth Annual*, Dublin: 1917; *Constitutions of the Maynooth Mission to China* (1918) (CFCA, CA F-3); Edward Glavin, *Letters from an Irish Missionary in China*, Dublin, 1916.

7 Smyth Bernard, *The Chinese Batch: The Maynooth Mission to China, origins, 1911-1920*, Dublin: Four Courts, 1994.

8 该项目的成果保存在爱尔兰国立大学梅努斯图书馆。参见Columban History Project, *Columban Oral History Archive*, Navan, Co. Meath: Columban Fathers, 2006.

9 Neil Collins, *The Splendid Cause: 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St. Columban (1916-1954)*, Dublin: The Columban Press, 2009.

10 西方主流观点往往认为，传教运动是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价值观取代中国落后的传统文化的过程。参见，Joseph Lennon, *Irish Orientalism*,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82.

11 Patrick Comerford and Richard O' Leary, "'Heroism and Zeal': Pioneers of the Irish Christian Mission to China", in Jerusha McCormack ed., *China and the Irish*, Dublin: RTE, 2009, pp.80-87.

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此外，200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在爱尔兰外交部资助下成立的爱尔兰研究中心开展的中爱关系研究课题也吸引了爱尔兰学者的积极参与。这一领域代表性的成果有2010年正式出版的《爱尔兰的亚洲战略与中爱关系》一书。该书是在2007年由科克大学中国研究院和孔子学院主办的“21世纪的中国：政治、文化和商业”研讨会论文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其中主题之一是爱尔兰亚洲战略对中爱关系的影响，对亚洲战略的缘起、发展和前景作了较系统的论述。<sup>12</sup>该校博士生James Cuffe以当代中爱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为题进行了博士论文写作。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在中爱商业关系领域形成了研究特色。王黎明博士主持完成了《爱尔兰企业在华情况》大型调查课题，该方向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以中国商业文化为题完成了学位论文的写作。此外，也有学者开始关注爱尔兰建国后在国联和联合国中的对华关系：涉及爱尔兰在国联中对九一八事变和日本策动建立伪满洲国事件的立场、联合国成立之初爱尔兰内部有关对华关系的讨论；欧盟框架下爱尔兰对华关系等课题也有一定的成果发表。<sup>13</sup>

#### 4) 教育、社会、文化交流领域的研究

在教育交流领域，凡红教授结合科克大学孔子学院的发展探讨了教育和教育合作在双边关系中的作用。随着中国赴爱移民和留学生人数的增加，爱尔兰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对在爱中国留学生、移民对爱尔兰社会的认识、融入当地社会的情况、就业情况、宗教信仰进行了课题调研。<sup>14</sup>此外，爱尔兰人与中国在园艺（如比尔城堡的中国植物）、音乐领域的交流也通过研究者及当事人的论文和回忆录有所反映。<sup>15</sup>

## 2. 广义的中国问题研究

如前文所述，除有关传教士和中英外交史上爱尔兰人的作用等领域外，爱尔兰在中国思想经典、文学作品的译介等传统西方汉学研究领域一直比较薄弱。21世纪以来，有少量研究成果问世，虽仍未形成规模，<sup>16</sup>但已呈

现出一定的积极发展势头。与此同时，爱尔兰中国研究院和孔子学院则表现出注重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取向。

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Jerusha McCormack与John Blair教授合著的《西中文明比较》是一部侧重思想史视角的中西文明比较著作。另外，她还撰写了庄子对王尔德思想的影响、叶芝诗作中所反映的中国文化等比较文学方面的论文，反映了中爱文明的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主题。此外，近年来，都柏林切斯特比特图书馆的马啸鸿（Shane McCausland）博士在书法和中国画的历史、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艺术联系领域出版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2003年，他出版了《女史箴图：中国绘画、顾恺之、女史箴图之首幅杰作》，2005年出版了《日本画临摹顾恺之：大英博物馆一幅中国画的日本画摹本》，并重写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述了中国著名绘画大师赵孟頫（1254—1322）的艺术成就；出版了《日本画笔绘中国浪漫——切斯特比特图书馆藏画、狩野山雪作品〈长恨歌〉卷轴》（合著）等著作。

孔子学院的发展促进了爱尔兰学术界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例如，2009年7月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在都柏林举办了欧洲中国经济研究会首届研讨会暨英国中国经济学会第20届年会，就中国经济政策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做了深入探讨。2007年科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中国体育和北京奥运会”、“21世纪的中国：政治、文化和商业”等研讨会，在此基础上出版的《爱尔兰的亚洲战略与中爱关系》一书中除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的文章外，还包含了中国经济、教育、城市化进程及司法制度等方面的文章。2009年Jerusha McCormack教授主编的《爱尔兰人与中国》一书也收入了爱尔兰企业家反思中国商业文化、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文章。

### 3. 杰鲁莎·麦科马克教授与《爱尔兰人与中国》的编辑出版

杰鲁莎·麦科马克（Jerusha McCormack）曾在都柏

12 Hong, Fan., J. van Carsten Gottwald eds., *The Irish Asia Strategy and its China Relations*. Amsterdam: Rozenberg Publishers, 2010.

13 例如，Dermot Keogh and Mervyn O’ Driscoll, “Irish Multilateral Diplomacy and the China Question at the UN in the 1950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ino-Irish Relations, Beijing, 2009; Andrew Cottey and Natasha Underhill, “Ireland, China and the EU: Foreign Policy in a Europeanised Context”, in Fan Hong, J. van Carsten Gottwald eds., *The Irish Asia Strategy and Its China Relations*. Amsterdam: Rozenberg Publishers, 2010.

14 Richard O’ Leary, and Li Lan.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and Immigrants in Ireland, and their Engagement with Christianity, Churches and Irish Society*. Dublin: Agraphon Press, 2008.

15 参见，Brendan Parsons, “Transplanting China to Ireland: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Earls of Rosse”; also Hwee-San Tan, “Musical Meetings, East and West: The Chieftains in China”, in Jerusha McCormack, *China and the Irish*, Dublin: RTE, 2009, pp. 62–73, 88–102.

16 例如，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领域我们在爱尔兰只查到张辉的诗歌翻译一部作品。

林大学英语学院任教30年,提前退休后来华执教。近5年来,她一直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客座教授,并帮助北外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综合性、跨学科爱尔兰研究中心。在那里,她还同约翰·布莱尔教授(John Blair)一起为中国研究生撰写了教材,题名《西中文明比较》(*Western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omparisons*)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现在,他们正在重写该教材,将西方与中国反过来比较,供西方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时使用,更名《中国与西方的比较》(*Comparing China and the West*)后,将于2011年在美国出版。

2008年为迎接北京奥运会、2009年中爱建交三十周年和2010年世博会,爱尔兰国家广播公司邀请爱尔兰汉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和长期从事中爱文化、商务交流的著名社会活动家、记者和企业家以《爱尔兰人与中国》为题举办了托马斯·戴维斯系列讲座。讲座播出后,在爱尔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引起热烈反响。爱尔兰国家广播公司新岛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了该书英文版。爱尔兰总统麦卡利斯为该书的出版发来了贺信,爱尔兰驻华大使戴克澜先生为该书撰写了后记。爱尔兰外交部委托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在华翻译出版该书中文版。该书中译本已于2010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爱尔兰人与中国》是近年来爱尔兰中国研究,特别是中爱关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主要包括11位作者撰写的文章,勾勒了自爱尔兰独立建国前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至今爱尔兰人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和当代双边文化、商务交流的现状,部分文章也涉及双方思想的相互影响,发展模式的借鉴等内容。内容包括中英外交史上马夏尔尼伯爵觐见乾隆皇帝、担任清朝总税务司的赫德爵士的在华经历、爱尔兰在华传教士的工作、庄子对王尔德思想的影响、双方的音乐、园艺交流、爱尔兰人对中国城市化、商业文化的理解以及爱尔兰中国移民的生活状况等。

### (三) 机构发展

21世纪前十年,爱尔兰高等院校和其他相关机构的中国问题研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在爱尔兰中国学的发展和与中爱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机构及其开展的活动如下。

## 1. 都柏林大学(UCD)中国研究院与孔子学院<sup>17</sup>

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UCD Confucius Institute for Ireland)与爱尔兰政府、商界及学界共同致力于促进爱尔兰与中国间的教育、文化和商务联系。UCD孔子学院由国家汉办(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和都柏林大学合办。学院成立于2006年,坐落于都柏林大学的Belfield校区。UCD孔子学院目前的主要目标包括:提升中国语言及文化在爱尔兰的影响;提供汉语学习课程;在都柏林大学组织文化与教育活动,以促进大众对中国的认识;促进中国研究方面的教学与研讨;提供能加深中爱贸易关系的专业服务;以及组织建立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中心。除汉语教学外,UCD孔子学院的课程设置在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侧重商务与文化的关联,同时开设一定的面向普通市民的书法、太极拳等中国文化课程。

## 2. 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UCC)中国研究院与孔子学院<sup>18</sup>

科克大学孔子学院(Irish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 UCC Confucius Institute)自2007年底成立至今,在当地社会做了大量的汉语及中国文化推广工作。UCC孔子学院目前的办学理念主要包括:培养在21世纪能够与中国进行有效交流的爱尔兰人才;教育和提升民众对中国与爱尔兰间的相互理解;促进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帮助推行爱尔兰政府的“亚洲战略”并促进爱尔兰的经济发展;以及协助该校国际教育学院为中国学生提供教育机会,并营造中国与爱尔兰之间的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其中UCC的中国研究课程除汉语学习外,还包括了当代中国历史、文学、中国哲学、商务和市场研究、政治思想和经济以及社会理论等课程。截至2009年底,该校建立了较完整的本科和硕、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在读学生达200多人。2009年该校在中国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教学院系建制的亚洲学院,招生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 3. 爱尔兰国立大学梅努斯

爱尔兰国立大学在进入21世纪后一直致力于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院校进行学术和教育交流与合作,支持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建设,并



17 <http://www.ucd.ie/china/>.

18 <http://www.ucc.ie/en/DepartmentsCentresandUnits/ChineseStudies/>.

积极创造条件开展中国语言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该校于2009年开设了汉语课程，2010年春与科克大学孔子学院合作启动了孔子课堂项目。目前正在筹办本科及研究生层次的中国研究项目。

#### 4. 爱尔兰中国学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in Ireland - ACSI)<sup>19</sup>

该协会成立于2006年，依托都柏林大学中国研究院和孔子学院，以促进在爱尔兰境内的中国研究活动，特别是科研和教学方面的发展。基于这些目标，协会组织关于中国研究跨学科的国际会议和相关课程，并定期出版信息交流会刊。

#### 5.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女王大学位于北爱尔兰，在长期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学术积累，收藏有关于赫德爵士的多种藏品，曾招收来自中国台湾地区从事相关研究的研究生，并与中国学术机构（如社会科学学院）建立了联系。该校历史与人类学系教师理查德·奥里里博士等积极参与爱尔兰中国研究学会（UCD）的活动，研究兴趣也从赫德研究拓展到中国宗教、移民等领域。

#### 6. 都柏林切斯特比特图书馆

都柏林切斯特比特图书馆是爱尔兰最好的博物馆之一。该馆收藏有大量关于中国的绘画、玉器、珍本等藏品，其中包括《永乐大典》、乾隆玉册等。该馆研究人员，如收藏部主任马啸鸿（Shane McCausland）在中国艺术研究领域颇有造诣，同时近年来该馆也积极协助都柏林市政府利用春节庆祝活动举办讲座、展览，推广中国文化。

### 三、爱尔兰中国研究发展的趋势与启示

从以上两国建交三十年的历史回顾看，在前二十年中爱尔兰中国研究的问题领域的局限性和偏重历史问题的特点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爱尔兰的小国特点及其与英国学术出版界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特殊依赖关系，使之在中国知识问题的多数领域成为消费者而非制造者，只是在历史上爱尔兰人与中国交往的一些领域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这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研究状况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总体上看，这些研究不是传统意义上以政治经济关系为主线的外交史，也与西方汉学注重中国语言、文

化、思想经典的传统存有距离，更多地是通过学者的文献研究和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对广义的爱尔兰人与中国间的文化、思想、社会联系做出的历史叙述，更多地是个人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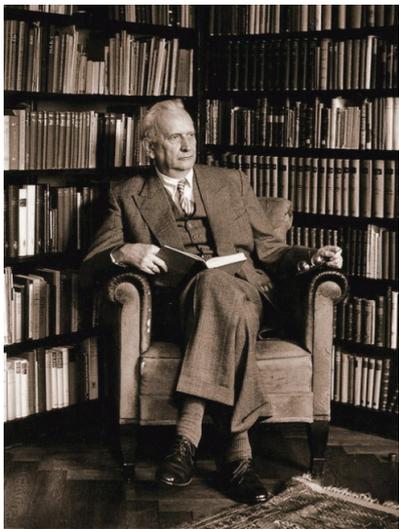
三十年来，爱尔兰中国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爱尔兰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经历，其身份界定表现出多重身份并存的复杂性（如许多历史人物既是爱尔兰人也是英国人）。但许多研究仍强调爱尔兰民族特性或在爱尔兰生活的经历对其在中国的经历的影响，爱尔兰特性成为其中国研究的关键词。其次，近十年来，爱尔兰中国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良好发展势头。研究领域明显扩大，开始关注当代中爱政治经济关系和文化交流，对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也表现出更大兴趣。再次，当前爱尔兰中国研究无论是历史叙述还是当代问题的讨论，作者大多关注其所反映的宏大的时代变迁及其与当代中国和爱尔兰社会的联系。尽管目前正式出版的文献数量有限，但可以预见，假以时日，爱尔兰中国研究将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

随着中国崛起、和平发展历史进程的深入发展，中国对爱尔兰人而言重要性日益增强，同时爱尔兰民族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正在经历重新塑造身份认同的过程，因而也需要在两国的深入交往中，通过自身视角，而非通过其他国家审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按照东方学的观点，爱尔兰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将伴随着其对自身文化观念和历史的建构过程不断发展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并非只能发挥无所作为的被动角色。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以孔子学院建设为重要内容的国家软实力建设，在爱尔兰中国研究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和科克大学孔子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通过对中国语言、文化和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教学与研究有力地推动了爱尔兰中国研究的深入和普及。当然，目前爱尔兰中国研究的发展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过于注重中国商务、经济研究的功利主义倾向，而哲学、文学等基础学科的推广和研究相对不足，这就需要在对外宣传、文化推广中通过切实可行的政策、策略做好引导工作，例如加强中国作家与爱尔兰同行的交流，通过出版资助促进中国文化经典和文学作品的英译、推广工作，以促进两国人民间的交流与理解的深化。

<sup>19</sup> <http://www.chinesestudies.ie/index.html>.

# 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对老子的认识<sup>1</sup>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德国哲学家对老子的阐释，有着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因此尝试分析和挖掘其方法论与问题视角是很有意义的。而德国哲学家所处的德意志文化和历史氛围，决定了他们的老子研究是通过对作为客体的异质文化的分析，为自己理解自己提供一

面镜子。实际上，对德国哲学家老子研究的再认识，重要的不仅仅在于分析其所使用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关注其观点背后的问题意识及思想源泉。德国思想家由于在不同时代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都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对老子研究的问题意识也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不断变化。

较早对老子做哲学研究的是德国哲学家，包括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等著名哲学家，都对老子哲学做了阐述。其中尽管不乏今天看来很粗疏的研究，但作为当时主流思潮中的哲学家，他们将老子研究纳入他们的学术视野和哲学体系之中，这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对老子思想的重视。作为20世纪上半叶存在哲学巨擘的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1969），也曾深入地探讨过老子的学说，在1959年出版的《大哲学家》（Die großen Philosophen）一书中，<sup>2</sup>他将老子归在了“原创性形而上学家”的范

畴之中，进而与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斯、安瑟尔谟、斯宾诺莎以及龙树并列。跟以往的哲学家不同，雅斯贝尔斯对老子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勾勒出老子思想的大概了，而是在史陶斯（Viktor von Strauss, 1809-1899）、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等人的译本和阐释的基础之上，尝试对老子进行全新的诠释。雅斯贝尔斯以其哲学方法深入到了老子的文本之中，他在很多具体的细节方面常常有突破性的新理解。他以独特的方式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同时，这项研究本身也完善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

## 1. 雅斯贝尔斯对老子思想认识的资料来源

从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书后所列的“参考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与“老子”一章有关的“原始资料”和“研究资料”，从中可以看出雅斯贝尔斯对老子思想认识的资料来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有哪些“原始资料”：

*Tao te King*, deutsch mit Kommentar und Einleitung v. V. V. Strauss, 1870, Neudruck Leipzig 1924.

（《道德经》。史陶斯译成德文，并附有评论与导论）

*Tao te king*, aus dem Chinesischen übers., mit Einleitung versehen und erläutert v. J. Grill, Tübingen 1910.

（《道德经》。v. J. Grill译自中文，并附有导论和解释）

*Tao te king*, deutsch v. R. Wilhelm, Jena 1915.

（《道德经》。卫礼贤德译）

*Tao te king*, deutsch v. J. S. Weiß, Leipzig o. J.

（《道德经》。J. S. Weiß德译）<sup>3</sup>

*Laotse*, herausgegeben v. Lin Yutang; aus dem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课题研究成果。

2 Karl Jaspers, *Die großen Philosophen*. München: Piper Verlag, 1957. 此书中译本为：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等译：《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3 此处，雅斯贝尔斯将John Gustav Wei 的名字错误地缩写为：J. S. Weiß，应当为：J. G. Weiß。

Englischen ins Deutsche übers., Frankfurt a. M. O. J. (1955).

(《老子》。林语堂著，自英文翻译成德文)

可以看得出来，雅斯贝尔斯选取了当时德语世界中最重要的老子译本。除了史陶斯的译本之外，他还使用了包括格里尔 (Julius Grill, 1840-1930)、卫礼贤、魏斯 (John Gustav Weiß, 1857-1943)、林语堂的译本。

作为图宾根大学新教神学的旧约学学者，格里尔的《道德经》译本更多地是从哲学上阐述老子的主张。他指出：“就老子作为一种伦理世界观的创立者而言，在这位中国智者那里，我们可以获得最高的意义尺度。”<sup>4</sup>此外，作为基督教神学的教授，在这个译本中，格里尔也一再对耶稣和老子的思想进行比较。

选择卫礼贤的译本是理所当然的，首先他的译本是最全的，几乎涵盖了儒、道等中国文化的的所有最根本的经典。其次作为受过西方传统新教神学训练的同善会的传教士，卫礼贤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他的大部分译作都是跟中国学者共同完成的。《易经》的译本就是他跟前清遗老劳乃宣共同研究《易经》十余年的结晶。尽管他的翻译受到过专业汉学家如福兰格 (Otto Franke, 1862-1946) 的指责，但这丝毫不能减弱它们在德语国家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影响。对卫礼贤的翻译，雅斯贝尔斯也并非一味地盲信，一次他在引用卫礼贤的译文之后写道：“如果卫礼贤的翻译是恰当的话。”<sup>5</sup>这说明他是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运用译本的。

曾担任过内卡河畔的艾博巴赫 (Eberbach am Neckar) 市市长34年之久的魏斯，对历史、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道德经》并不是一个新的译本，而是将以往的德文、英文和法文的译本与中文相比较之后产生的“合本会译”的结果。他在前言中指出，他的目的在于从不同的译本中捋出一个头绪来。

而林语堂的《老子的智慧》<sup>6</sup>则为雅斯贝尔斯提供了中国人对老子哲学理解的视角。

雅斯贝尔斯之所以选取了《道德经》的诸多不同译本，他曾通过第六章的一个例子予以说明：“我想规劝大家的是，只读唯一的一种译本是不可取的做法。”<sup>7</sup>

相关的“研究资料”如下：

Chantepie de la Saussaye:

*Lehrbuch der Religionsgeschichte: vierte, vollständige neu bearbeitete Auflage*, hrsg. v. A. Bertholet u. E.

Lehman, 2 Bde., Tübingen 1925.

(宋赛耶：《宗教史读本》。蒂宾根，1925年)

Forke, Alfred:

1. *Geschichte der alt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Hamburg 1927.

2. *Geschichte der mittelalterlich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Hamburg 1934.

3. *Geschichte der neuer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Hamburg 1938.

(佛尔克：《古代中国哲学史》。汉堡，1927年；《中世纪中国哲学史》。汉堡，1934年；《近代中国哲学史》。汉堡，1938年)

Granet, Marcel:

1.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Paris 1929.

(葛兰言：《中国的文明》。巴黎，1929年)

2. *La pensée chinoise*, Paris 1934.

(葛兰言：《中国的思想》。巴黎，1934年)

Groot, J. J. M. de:

*Universismus – Die Grundlagen der Religion und Ethik, des Staatswesens und der Wissenschaften Chinas*, Berlin 1918.

(德·格罗特：《天下大同说——中国的宗教与伦理、国家制度以及学术的基础》。柏林，1918年)

Grube, Wilhelm: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Leipzig 1909.

(格罗贝：《中国文学史》。莱比锡，1909年)

Hackmann, Heinrich:

1. *Chinesische Philosophie*, München 1927.

(哈克曼：《中国哲学》。慕尼黑，1927年)

4 *Tao te king*, aus dem Chinesischen übers., mit Einleitung versehen und erläutert v. J. Grill, Tübingen 1910. S. VI.

5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等译：《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0页。

6 Lin, Yu-tang. *The Wisdom of Lao-tse*, translated,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Lin Y.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1948.

7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等译：《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54页。

2. *Der Zusammenhang zwischen Schrift und Kultur in China*, München 1928.

(哈克曼:《中国文字与文化间的关系》。慕尼黑, 1928年)

Wilhelm, Richard:

1. *Kungtse*, Stuttgart 1925.

(卫礼贤:《孔子》。斯图加特, 1925年)

2. *Kungtse und der Konfuzianismus*, Berlin 1928.

(卫礼贤:《孔子和儒家学说》。柏林, 1928年)

3. *Chinesische Philosophie*, Breslau 1929.

(卫礼贤:《中国哲学》。布雷斯劳, 1929年)

Zenker, E. V.: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2 Bde., Reichenberg 1926-1927.

(岑科尔:《中国哲学史》。2卷本, 莱辛贝尔格, 1926-1927年)

在以上的“研究资料”中雅斯贝尔斯列举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奥地利、法国、荷兰著名汉学家、比较宗教学家有关中国思想和哲学的名著。佛尔克(Alfred Forke, 1867-1944)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基本上是以中文原始文献为出发, 对三千余年的中国哲学作了系统的梳理。书中除了对孔子、老子等哲学大家作了重点介绍之外, 还介绍了中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许多其他哲学家的思想, 共计150多人。这三部著作的特点之一在于同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佛尔克将中国传统哲学分为逻辑与认识论、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国家哲学与法哲学几个部分, 并且常常在相应的范畴内直接与古希腊的哲学进行互释。特点之二在于书中收入了大量中国著名典籍原文的译文, 这对于想借助于原文进一步思考的西方读者来说, 至关重要。这套2000页之多的巨著使佛尔克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葛兰言(Paul Marcel Granet, 1884-1940)所重视的并不是以往传统法国汉学家所热衷的文献学和历史学, 由于受到当时法国主流社会学家涂尔干(E. Durkheim, 1858-1917)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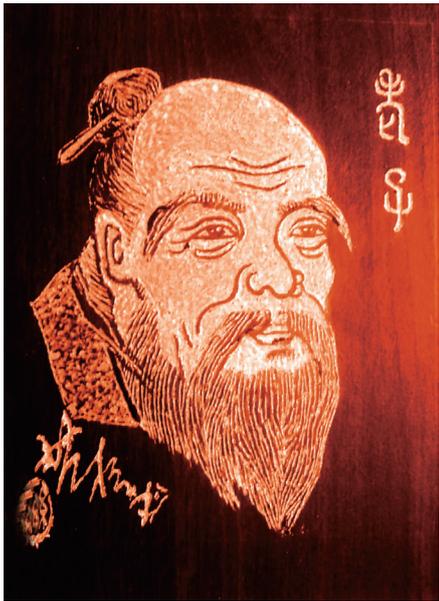
他将社会学的方法成功地引入汉学研究。雅斯贝尔斯所列举的《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思想》可以说是葛兰言在这方面的代表之作。曾于1891-1911年、1912-1921年间分别担任荷兰莱顿大学以及德国柏林大学汉学教授的格罗特(Jan Jakob Maria de Groot, 1854-1921), 是中国宗教问题的专家。他认为, 中国的宗教、整体思想应当称之为“天下大同说”(Universismus), 因为在这之前经常使用的“儒家学说”(Konfuzianismus)一词仅仅是构成中国整体宗教思想的一部分而已。除了在“孔子”一章中, 雅斯贝尔斯在“老子”里也同样使用了“天下大同说”的概念。德国汉学家格罗贝(Wilhelm Grube, 1855-1908)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09年, 尽管名为文学史, 但其范围却涉及到了中国文化史内容, 由于这部著作所征引的大部分例子均来自中文原文, 因此直到今天它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哈克曼(Heinrich Friedrich Hackmann, 1864-1935)曾作为同善会的传教士在上海居留多年, 1914-1934年间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汉学教授。他对中国宗教特别是佛教有深入的研究。他的《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字与文化间的关系》两部著作作为雅斯贝尔斯全面了解中国文化, 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知识。

这些原典译本和研究著作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的朋友——印度学家海因里希·齐默尔(Heinrich Zimmer, 1890-1943)博士。<sup>8</sup>1938年以后雅斯贝尔斯开始研究远东文化, 这对雅氏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而作为印度和东亚文化专家的齐默尔则为雅斯贝尔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 并一直与雅斯贝尔斯在这一崭新的思想世界中进行对话、讨论。雅氏在研究、写作“孔子”、“老子”和“龙树”时, 齐默尔一直是他的重要的助手。两人在1929-1939年间现存的十几封通信中, 有几封非常集中地探讨过中国哲学, 并且一再提到《汉学》(*Sinica*)刊物、孔子、佛教、寒山与拾得, 也提到哈克曼等汉学家的名字和著作。<sup>9</sup>

雅斯贝尔斯之所以没有使用中国典籍较新的英文译文和研究著作, 在于他依然固守着他之前多年以来所

8 雅斯贝尔斯后来在《哲学自传》中写道:“1939年春天, 我有幸与印度学学者海因里希·齐默尔结为朋友……我在与海德堡人交往中最后听到的含蓄宽广而又见识深邃的言论, 就是他的谈话。从他的渊博知识中我得到了很多, 他关心我, 带给我许多中国与印度世界的文献和译文。”王立权译:《哲学自传》,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年, 第76页。

9 《雅斯贝尔斯/齐默尔:1929-1939年间来往书信集》, 收入:《奥地利卡尔·雅斯贝尔斯协会年鉴》, 1993年度。(Karl Jaspers/Heinrich Zimmer: Briefe 1929-1939, aus dem Nachlass zusammengestellt von Hans Saner und Maya Rauch, in: *Jahrbuch der österreichischen Karl-Jaspers-Gesellschaft*, hrsg. v. Elisabeth Hybaek und Kurt Salamun, Jahrgang 6 [1993], VWG -Wien, S. 7-24.)



形成的德意志哲学传统。<sup>10</sup>尽管这些德、法文的文献中有个别的已经有些过时了，并且大部分都是用西方哲学史的方法和概念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类比、比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中大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德国汉学界对中国思想和哲学的研究水平。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雅斯贝尔斯对老子的研究显然并非出自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兴趣，对中国哲学的认识是构建其“世界哲学”蓝图的一个重要步骤，而将老子作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正是他运用“轴心时代”的思想，排除特定信仰内容，使之成为让西方人、亚洲人乃至全人类都可以信服的尺度的尝试。

## 2. 史陶斯的《老子》译本

### 2.1 对史陶斯老子译本的评价

作为哲学家的雅斯贝尔斯尽管使用了史陶斯以来《老子》的各种译本，但他并没有将他的探索局限于早期汉学家研究的基本立场和理解框架，而是突破了传统语文学汉学研究的藩篱，以哲学特别是存在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达成了对老子的独特理解。而基于语文学传统的史陶斯《老子》译本，无疑为雅斯贝尔斯的哲学阐释奠定了基础。

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中对史陶斯的《老子》译本大加赞赏：

**史陶斯所作的注释在于把读者引向翻译中的**

**难点问题，中文原句的意义以及词句的多种含义。此外，他受过传统的德国哲学训练，因此他的阐释透彻、审慎，有时也带点奇特的哲学味道。即便是译文晦涩难懂，也会在注释中找到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在使用这一杰出的译本同时，我还参照了其他新出的一些译本。在发现这些新译本跟史陶斯的译本有偏差时，再读史氏的注释，真令人信服不已，他会告诉你他之所以这么译的理由，并且他常常事先就能认识到后来才出现的异议。史陶斯这本乍读起来令人费解的译本，也许正因为此才是最好的译本。这一译本不易读懂，需要借助于注释的帮助才能理解那简短、含蓄的背后所隐藏的真意。<sup>11</sup>**

雅斯贝尔斯深深地知道，仅仅通过译本的比较研究来达到对老子思想的整体把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

**对于那些不是汉学家的人来讲，对这本书的研究只能是通过对比为数众多的译本以及评注比较来进行。如果像读康德、柏拉图、斯宾诺莎那样来读老子，他将一无所获。译文毕竟不像使用自己的语言那样直截了当，而像是透过含混不清、雾气蒙蒙或过于直接让人领悟的中间媒介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况且，单音节的汉语语言以及汉语文字语言的特征，对我们来说都是极为陌生的，因此不是汉学家的人是不可能确定其确切性的。（参阅：如哈克曼）<sup>12</sup>**

雅斯贝尔斯能通过译本和研究著作，而不用通过研读原文，迅速把握住这些经典的精髓所在，是跟他所选择的这些资料有很大关系的。在这里，他对《老子》译本的研读，很像是东晋时期道安（314—385）“合本会译”方法的运用，即以不同的般若系经典译本，互相参照补充。道安的弟子僧叡（约354—约420）后来参加了鸠摩罗什（344—413或350—409）的译场，他在《大品经序》中认为道安对性空的理解是符合般若思想的：“标玄旨于性空，……矍矍之功，思过其半。”通过译本和研究著作，而不用通过研读原文，快速把握住这些

10 1957年2月24日雅斯贝尔斯在写给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信中，在谈及Mai-Mai Sze所著的*The Tao of Painting*（New York 1956）一书的参考书目时写道：“当我看到参考文献时，感到异常悲哀，在世界上我们德文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了，最著名的、难以望其项背的史陶斯（Viktor von Strauss）的老子译本和评论，竟然在本书中没被引用，反之所有引文均为英文和法文。”见：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6—1969*, hrsg. von Lotte Köhler und Hans Saner, München, Zürich: Piper Verlag, 1993, 2001(2. Aufl.), S. 349.

11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等译：《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54页。

12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等译：《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54页。

经典的精髓所在，这当然需要一个人的智慧和禀赋。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在论述到雅斯贝尔斯的这一特征时写道：

一个人在不掌握那种思想所依赖的母语的情况下能摸到这种思想的哲学轮廓，他一定具有某种特殊的天赋。我想把这种天赋称为相貌学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不是来自于语词，而是懂得从轮廓里读出东西。无疑，这种释读方式无法掌握细节上独到的东西，但他能推断和描述出大致的线条，而这个线条蕴含在所有人的思想运动中。<sup>13</sup>

只有大手笔者才可以做到这一切，即通过阅读译文迅速把握住思想的精髓所在，而不拘泥于枝节末梢。尽管雅斯贝尔斯在细节上无法领会很多中国哲学独特的东西，但他却能迅捷而准确地领略到这一哲学的基本特征。在这一点上，不懂中文的雅斯贝尔斯跟不懂梵文的道安的确有共通之处。

2.2 汉学家史陶斯以及其他学者对“轴心时代”观念形成的影响

史陶斯的《道德经》译本不仅为雅斯贝尔斯论述老子思想提供了底本，同时也为他的“轴心时代”（Achszeit）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史实。

雅斯贝尔斯除了对《道德经》译本倍加赞赏外，他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还援引了史陶斯在《老子》译本中有关“轴心时代”史实的评论：

在中国的老子和孔子所生活的几个世纪中，所有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都经历了一场奇妙的思想运动（Geistesbewegung）。在以色列，耶利米（Jeremias）、哈巴谷（Habakuk）、但以理（Daniel）和以西结（Ezechiel）等先知在预言着未来，而创新的一代（前521—516）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第二座神殿。在希腊人当中，泰勒斯（Thales）依然活着，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赫拉克利特（Heraklit）以及色诺芬（Xenophanes）也纷纷登场，巴门尼德（Parmenides）诞生了。在波斯人那里，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对古老教义的革新似乎已得到了实施。在印度则出现了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Schakia-Muni）。<sup>14</sup>

在这里，作为汉学家的史陶斯所谓“在中国老子和孔子所生活的几个世纪中”的“奇妙的思想运动”可能包括两次较大的突破：一是周灭殷商之后，周人进而从殷商神权崇拜和天命观的禁锢中苏醒过来，历史意识获得了解放；二是老子、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周王室已经式微，礼乐文明一蹶不振，孔子因此提出了“仁”、老子提出了“道”等著名的学说，从而使历史意识再次获得解放。正是这两次的突破，构成了中国智者终极关怀的觉醒。尽管在雅斯贝尔斯的著作中只提到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阶段的突破期，但无疑这是接受了汉学家史陶斯以上的看法。正是史陶斯和其他历史学家对轴心时代史实的描述，促使雅斯贝尔斯深层次地去思考这样的问题：纵观轴心时代的全貌，亦即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先哲在这一时期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我以及自我的局限，<sup>15</sup>而这些不可能是历史的巧合所造成的幻觉游戏。雅斯贝尔斯确信，这背后隐藏着某种深刻的共同的东西，即人类的本源（Ursprung des Menschseins）。<sup>16</sup>

而轴心时代更为精确的共时性，以及跟有意识、有思想的整个人类精神史的密切关联，<sup>17</sup>也使雅斯贝尔斯开始探究：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轴心时代的史实呢？史陶斯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无疑对雅斯贝尔斯极具启发性。史陶斯认为：

历史上并不缺乏类似的现象，而在其背后则隐藏着异常神秘的法则。这在一方面把具有共同起源的整个人类作为有机体而予以解释，另一方面人类同样以更高的精神潜力之影响作为前提。这就好像是促进自然繁荣的动力惟有通过阳光的反复映照，才能尽显其壮丽本色一样。<sup>18</sup>

13 伽达默尔著、陈春文译：《哲学生涯——我的回顾》（*Philosophische Lehrjahre*），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97页。

14 Karl Jaspers,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München: R. Piper & Co. Verlag, 1949, S. 28.

15 Karl Jaspers,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München: R. Piper & Co. Verlag, 1949, S. 20.

16 Karl Jaspers,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München: R. Piper & Co. Verlag, 1949, S. 32.

17 Karl Jaspers,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München: R. Piper & Co. Verlag, 1949, S. 35.

18 Karl Jaspers,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München: R. Piper & Co. Verlag, 1949, S. 35—36.

尽管雅斯贝尔斯认为，与其说史陶斯是在解释“轴心时代”的原因，毋宁说他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一神秘现象。史陶斯的错误在于，通过整个历史上的类似的例子，将轴心时代类似现象的历史事实的独特性降低了。<sup>19</sup>尽管如此，史陶斯所列举的史实对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形成的影响却是无疑的。

### 3. 道与统摄

#### 3.1 对《道德经》的评价

雅斯贝尔斯对老子的《道德经》有非常高的评价：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卓越的和谐之作。相同思想以多种多样的变通的方式予以重复，它是事实上的而非靠文字假名所阐明的一贯的体系，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得到这一特征。尽管书中并没有条理清晰的术语，但是从中依然可以把握住对事物整体性进行阐述的方法。它那充满悖论的语句所产生的说服力（不包括那些在智力上随意的诙谐游戏话），它那缜密的态度以及它那被引向似乎是神妙莫测境界的思想深度，使这部书成为了一部不可替代的哲学著作。<sup>20</sup>

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努力在于改变学院派哲学的体系传统，建立一种真正对人的存在有实质意义的新哲学。而老子对问题的阐述方式，让雅斯贝尔斯感到耳目一新。

按照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哲学分类传统，西方将哲学分为形而上学、宇宙起源说、伦理学以及政治学。当雅斯贝尔斯带着这些标签想将老子的思想做分类时，他却没能成功：

在老子那里，所有这一切都包容在“一”之中，这是老子敏锐深刻的基本思想。在一短短的章节、有限的几句话中，就同时包罗了所有以上四个

方面的要素。在对这些章节不得不进行阐述及逐一进行论述时，会涉及到这一哲学中的一种基本思想或对生活认识。只有当这个“一”在现实中相继为人们所认识时，这一阐述才算是达到了目的。<sup>21</sup>

老子的“一”是跟雅斯贝尔斯的“统摄”（das Umgreifende）非常接近的概念，因此，老子在阐述道时所使用的否定式的表达方式（negative Formulierung），也为雅斯贝尔斯认识统摄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何用有形的哲学概念来表达无形的“一”，为了避免人们将之误解为有限的存在者意义上的东西，必须要用一种无限的统摄的抽象思想来代替对周围一切有限事物的想象。

与“统摄”一样，老子的“一”也不在分裂之中，中国智者对它的认知方式，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

#### 3.2 道乃统摄

如果要研究雅斯贝尔斯对老子的认识，我们就无法脱离他所处的德国思想语境。作为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存在哲学家之一，雅斯贝尔斯对老子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考察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文明是以何种方式达到“统摄”的，老子在达至终极真理的方式方面，给予了雅斯贝尔斯极大的启发。同时，雅斯贝尔斯一直有建立世界哲学的雄心，这也奠定了他理解

欧洲以外的哲学的兴趣。他开始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欧洲以外的文明和哲学。因此，雅斯贝尔斯在研究老子时的思考路径和分析方法，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实际上，雅斯贝尔斯是在西方和中国思想传统的对比之中认识作为哲学家的老子的，老子对生命和社会的思考也使得雅斯贝尔斯对他哲学中的一些既定概念和范畴做了反思。

雅斯贝尔斯从老子的“道”中看到了他自己哲学中的核心概念“统摄”，他不仅认为这两者可以相互比较，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两者可以互为解释。“道”自身尽管是一个绝对肯定的整体，但不能用语言予以直接定义，而必须通过否定性的表述予以说明。



19 Karl Jaspers,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München: R. Piper & Co. Verlag, 1949, S. 36.

20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等译：《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53-754页。

21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等译：《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55页。

“统摄是那一直在昭示着的东西……，其自身永远不会成为对象或地平线。它是这样一种存在，其自身不出现，但其他一切皆从中向我们显现。”<sup>22</sup>雅斯贝尔斯一再强调，“统摄”跟“存在”一样，都是不可以被揭示为对象物的。<sup>23</sup>因为“统摄”存在于主客体的分裂之前。它是一切对象物的根本、源泉，其本身只能用否定性的方式予以表述。雅斯贝尔斯在解释“道”的时候说：“如若要谈论道，那必然要用否定的陈述形式……。如果想要肯定地说出其存在的话，这就意味着只是暂时的、有限的描述。”<sup>24</sup>“道乃统摄。”<sup>25</sup>

显然，世界是处于主客体分裂之中的，而“统摄”尽管包含了这一分裂，但其自身是不可能成为客体的。一旦我们进行思考，势必落入分裂的状态之中，但正是通过分裂后的对象性的临界状况，我们才会得到有关“统摄”的暗示，进而达到“统摄”本身。跟“道”一样，“统摄”也是不可以变为思考的对象，只要它成为了思想的内容，就不再是真正的、没有分裂的“统摄”了：

**道是先于世界之生成而存在的，故而它先于一切的差别。它是作为自在而被想象出来的，因此既不能与它物相比照，也不能在自身之中被分别。因而在道之中，譬如实然（Sein）与应然（Sollen）是同一的；世界中被分离的，相互对立的一切在先于世界之时是一体的；万物发生发展所遵循的法则，跟其所应当遵循的法则是同一个；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秩序，跟真正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所产生的秩序并无两样。但是这一对立的一体存在（Einssein）不能随即被理解为世界之中的一个特殊存在，也不可能是世界的全部。它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也是世界的终极。世界的形成意味着分离与区别，分裂与对立。<sup>26</sup>**

表面上雅斯贝尔斯在这里叙述先于世界生成而存在的“道”，实际上这一切正暗合了他的“统摄”的观念。

雅斯贝尔斯认为，跟人类社会上所有最伟大的哲学

家一样，老子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囿于已知的事物上，而是从“统摄”中捕捉着思考的源泉。他那延伸至最深远的思想真可谓无所不包。老子本人并不能被归于神秘主义者、伦理学家、政治家。老子的“道”乃是在超越了所有有限性时达到的最深层次的宁静，而有限本身，只要它们是真实的、现时的，也都充满着“道”。这一哲学思考便活在了世间，进入了世界的根源之中。

雅斯贝尔斯同样认为：

**这些哲学思考之局限性只有通过那些被超越之物出现或不出现时，通过作为在时间性意识中的现实性中不可避免的中间环节时，才显露自身。因为这些中间环节乃是进行超越的阶梯，或者说是使现实得以成为当前的方式，也正是借助于现实，根源才会被体验得到。这些中间环节在超越之中予以保留，并赋予如果没有它们的存在就变成空虚的超越以内容。在老子那里所感觉得到的局限并非在他哲学思想之巅峰，而是在这些中间阶段之中。<sup>27</sup>**

我们知道，雅斯贝尔斯在探究终极的真理时，很少谈及存在，他所关注的是存在的方式；很少谈及“统摄”，他所关注的是接近或达到“统摄”的方式。因此对他来讲，在“得鱼”之前，“筌”依然是至关重要的。<sup>28</sup>

#### 4. 结论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资源在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思想特别是老子和道家参与的话，“轴心时代”这一概念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反过来，正是借助于作为存在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的复述，老子的思想才变得鲜活起来，从而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实际上，中国只是雅斯贝尔斯寻求世界文明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希望通过世界不同文明发展进程的探寻，来思考和揭示人性存在的现状，进一步发现共同的起源和未来，从而为他的世界哲学理念提供一个更加广泛的基础。

22 Karl Jaspers, *Von der Wahrheit. Philosophische Logik*. Erster Band, München 1947 (4. Aufl. 1991), S. 38.

23 Karl Jaspers, *Von der Wahrheit. Philosophische Logik*. Erster Band, München 1947 (4. Aufl. 1991), S. 37.

24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等译：《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5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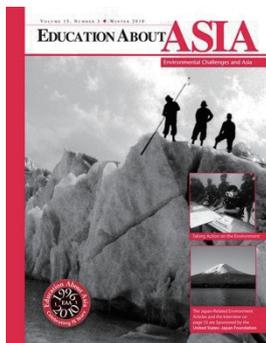
25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等译：《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57页。

26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等译：《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57页。

27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等译：《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80页。

28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等译：《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80页。

# 亚洲研究协会<sup>1</sup>



位于美国密歇根州的亚洲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成立于1941年，是一个非政治性、非营利性的学术机构，目前在全球拥有近7000名会员，是此类研究机构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协会现任负责人为Michael Paschal。每年春季，协会都会举办为期4天的年会。2011年年会将于3月底与国际亚洲学者协会（ICAS）共同举办，以纪念亚洲研究协会成立70周年。该协会最值得一提的是其出版物及文献索引系统。

协会季刊《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自1941年开始出版，主要刊发亚洲研究中的经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成果，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等；以中国、亚洲内陆、东南亚、东北亚、南亚为重点研究区域；该刊有高品质的书评，也关注新兴的研究话题，在亚洲研究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

1996年，协会创办了《亚洲教育杂志》（*Education about Asia*），每年出版3期，为高中和大学的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参考资源，对亚洲感兴趣的读者也能从中获得各个学科与亚洲相关的学术信息。

近年来，协会推出了两大书系，一个是“亚洲今

昔”书系，每年推出2—3本新作；另一个是主要面向高中生和高中教师推出的“亚洲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书系。此外，每年出版4期《亚洲研究简报》（*Asian Studies Newsletter*），提供有关亚洲研究的会议、研究项目、出版物、网络资源、奖励、就业机会等方面的资讯。

协会的“亚洲研究参考文献索引”（BAS）被公认为亚洲研究领域的权威索引工具之一，2010年该索引系统推出了电子版，囊括了77万余条包括书籍、刊物、文章、传记、丛书相关部分节录、会议等方面的索引信息。此外，协会网站提供了大量与亚洲研究相关的链接（按亚洲概览、东亚、南亚、东南亚归为4类）。

## 联系方式：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

1021 East Huron Street

Ann Arbor, MI 48104 USA

Tel: (734) 665-2490

Fax: (734) 665-3801

<http://www.aasianst.org/>

<sup>1</sup>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4日。

# 哈里·哈丁教授及其中国研究

张效民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哈里·哈丁教授，1946年生于波士顿（Boston, Massachusetts），196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关系学士学位（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University），并分别于1969年和1974年获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political science, Stanford University）。哈里·哈丁曾任职于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1970-1971）和斯坦福大学（1971—1983），期间他还兼任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主任（Asia Program at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70-1980）；1983—1994年间，他成为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Foreign Policy Studies Program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作为一名国际事务和政治学教授，他从1995年到2005年一直担任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自2005年到2007年，哈丁先生担任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研究分析部主任，成为该集团的重要顾问。欧亚集团总部在纽约，是一家政治风险研究和咨询公司。同时他还是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Senior Fellow in the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Asia Society）。2007年哈丁重返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学院。2009年1月哈丁开始担任弗吉尼亚大学巴顿领袖与公共政策学院第一任院长（Founding Dean of Batten School of Leadership and Public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该院由弗兰克·巴顿（Frank Batten Sr.）捐资1亿美元筹建，着眼于培养未来的领导人。除此之外，哈丁先生还曾任全美国国际事务学院联合会（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执行主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美国委员会（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主席以及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主任等职。目前他担任的其

他职务主要有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副主席、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Asia Society）高级研究员和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顾问等。

哈丁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国内政治、中国对外政策、中美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等。其主要著作包括《组织中国：官僚问题，1949—1976》（*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6-1976*，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1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对外关系》（*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泽东之后的改革》（*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布鲁金斯学会，1987年）、《中国与东北亚：一种政治维度》（*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The Political Dimension*，美国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美关系史上最沉重的一页：1945-1955》（*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bate*，与袁明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脆弱的关系：1972年之后的美国与中国》（*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布鲁金斯学会，1992年）以及《中印关系：美国需要了解》（*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与弗朗辛·R·弗兰克尔合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等。此外，哈丁先生还撰写了大量学术论文和政治评论。

## 信息来源

<http://www.cnas.org/node/899>; [http://www.carnegiecouncil.org/people/data/harry\\_harding.html](http://www.carnegiecouncil.org/people/data/harry_harding.html); <http://www.virginia.edu/uvatoday/newsRelease.php?id=7633>;  
<http://www.blogger.com/profile/12139801545344153306>



# 亚洲研究动态

##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栖霞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谷晨曦 韩慧英

E-mail: [icwar@bfsu.edu.cn](mailto: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